

5·18 去汉剧博物馆看看

江城五月落梅花，还有一个“5·18”——世界博物馆日。

世界博物馆日 1977 年设立，春风化雨 48 载，催动人们的脚步走向一个个博物馆。

今年，武汉“博物馆之城”又添一座汉剧博物馆，设在人民剧院——过去赫赫有名的“大舞台”，号称汉口三大“京戏窝子”之一。20 多年前，“汉戏窝子”清芬剧场歇业，汉剧转场到人民剧院坚持演出，一批铁杆拥趸相依相随，苦苦维系丝弦不歇。

要说，汉剧博物馆安在清芬剧场最为“情景化”，它的前身美成大戏院，从陈伯华到吴天保，唱红几代大师。前几年，它圈入拆迁改造的围挡，赶去抢拍了门楣“清芬剧场”最后的印迹。

汉剧艺术源远流长，赓续 400 年，剧目 800 出，上承昆曲下启京剧。1790 年“徽班进京”，1840 年“汉调北上”，双双孕育京剧走向成熟。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评定八大剧种，汉剧当之无愧荣膺一席。2006 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

过去，好想了解汉剧历史文化，苦于没有博物馆。去苏州，人家那里昆曲、评弹两大博物馆，傍着小桥流水，时有演出“活化”存在。2018 年，听说湖北音乐博物馆展示“汉剧文物收藏第一人”刘立的藏品，专程跑去一睹为快。2019 年，纪念陈伯华诞辰百年，武汉博物馆举办专题展览，武汉剧院举办专场演出，“一赶二”超值享受。2021 年，武昌紫阳公园升级后开放，碰上紫阳大戏台票友雅集，咿咿呀呀贴着水波袅袅飘来。蓦然回首，紫阳阁竟有汉剧历史文化陈列，惜乎当天闭馆望“阁”兴叹。

如今好了，走进汉剧博物馆，主题“宏宣江汉流芳梨园”，就是大剧种的气势。162 件珍贵物品目不暇接，“镇馆之宝”点翠凤冠和点翠头面，乃是陈伯华《宇宙锋》的饰物。大屏幕循环播放老影像，1959 年的《宇宙锋》，1954 年的《二度梅》，还有久未谋面的《三请樊梨花》。

在汉剧博物馆库房，脚本、服装、乐器等超过万件，当然集藏汉剧文化，同时折射武汉戏码头风华。有道是“货到汉口活”，殊不知“戏到汉口红”，豫越评秦腔梆子荟萃一地，汉派京剧独树一帜，京沪大佬都认账。那么下一个博物馆，会不会属意汉派京剧或戏码头？

武汉民间，一批有识之士呵护戏码头的根脉。汉口北有个“戏码头街区”，八旬老人闵晏清的戏曲史料馆收藏 5000 多件，尤以“谭门七代”的百年脉动骄人。武昌水陆街朱汉昌的小小斗室，仅《黄鹤楼》《游龟山》二剧，就有 30 多个剧种的唱本、剧照等数百件。在晴川阁，也遇过一次楚剧珍品展，见识了它别开生面的“戏箱”。

武汉戏码头——城市史的瑰丽篇章，博物馆是一种打开方式，汉剧夺得“首秀”。

（简桦）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罗联峰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子渝 刘玉堂 刘庆平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张笃勤 陆永初

陈芳国 姚伟钧 涂文学 彭小华

编委会主任：陈诗亮

副主任：朱向梅 刘洪波 熊少明

董菲 杨华 阮祥红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桥 王四清 朱永利 刘海燕

李文洲 李敏娟 张冰峰 张智勇

陈红英 林伟 唐云峰 谭艺琴

潘红莲

主编：阮祥红

副主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行主编：丁星火

特约编审：简桦

本期责任编辑：刘玮

编辑：许濛 章旷怡

封面设计：王鹏

阅城偶记

<<< <

1 5·18 去汉剧博物馆看看 / 简桦

时代年轮

<<< <

4 1985，黄鹤楼重归白云间 / 罗建华

风雨同舟

<<< <

12 以“小信息”写好履职“大文章” / 汪东华

九城同心

<<< <

17 1988年，张光年到访“武赤壁” / 李城外

委员天地

<<< <

20 助推武汉“年轻一代”破茧成蝶

/ 杨宵（口述） 章旷怡（整理）

24 从菜薹到莲藕：我的乡村振兴共富路 / 冯军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商聚汉皋

<<< <

27 厚德实干，义利天下 / 万明才

烽火江城

<<< <

31 江北喋血（上）：潜太与黄广战役
——“保卫大武汉”系列之五 / 涂文学

人物述林

<<< <

38 黄绍竑任职湖北省政府主席前后 / 席 丹
47 陈时与近代中国第三次全国运动会 / 陶光胜

都市寻踪

<<< <

52 从崇府山到花园山（上） / 董玉梅
59 武汉市地方粮票简史 / 赵文兵

扫街探疑

<<< <

62 江汉关的“关址三迁” / 王汗吾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82220669（传真）

E-mail：whzxwszl@163.com

1985，黄鹤楼重归白云间

◇ 罗建华

轮印：1985年6月10日，黄鹤楼重建开放，“白云黄鹤”实至名归，“天下江山第一楼”再现盛景。40年后，央视蛇年春晚武汉分会场相中黄鹤楼，江城风韵传播全球。

1985年，武汉盛事频出。元旦中南商业大楼开业，春节武汉动物园开园，年末洪山体育馆开馆。6月10日，一个并非特别的日子，更有黄鹤楼张开双臂迎接游客——它知道，人们已等候得太久太久。

一个武汉伢的留影情缘

我们这一代，“黄鹤楼情结”是从小播下的种子。父亲在武昌青龙巷出生长到9

岁，正是贪玩的年龄段，穿过司门口几步就上了蛇山，曾经从山头奥略楼跑到江边警钟楼，没少讲有关黄鹤楼的往事。

黄鹤楼最经典的一个民间传说，武汉伢特爱听：从前，四川人与湖北人比高，眉飞色舞夸耀“四川有个峨眉山，离天只有三尺三”。湖北人不动声色，只说“湖北有个黄鹤楼，还有半截云里头”，一下就把四川人“比化了”，蛮给湖北人长脸的。另有一句“黄鹤楼上看翻船”，绝不是幸灾乐祸，而是登高望远，在表达世事洞明之时，也点赞黄鹤楼之高。此外，一直与黄鹤楼相伴的胜像宝塔，民间叫它“孔明灯”，传说它夜夜灯火不熄，为两江交汇的行船引航，摇桨人视之圣物，来往客商都要烧香膜拜。

可惜，最后一座黄鹤楼在光绪十年（1884年）焚毁，我们小时候，只能从老牌子“黄鹤楼”香烟盒子上，想象它的气度不凡。

1985年6月10日盛事降临，黄鹤楼重建开放举行典礼，多达2000余名各方嘉宾云集，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第二天，黄鹤楼打开大门，“气吞云梦”横匾下，游人蜂拥而进，登楼一览江天。两股人潮一上一下交错蜿蜒蠕动，只能用那句“下不来的黄鹤楼”来形容。

黄鹤楼阔别百年之久，武汉人早就迫不及待，无不一睹为快。虽然春天已近尾声，各单位组织“春游”，无不首选黄鹤楼。我所在的武钢技术监督处，第一时间约不上，排到后来成了“秋游”。那时儿子刚满两岁，还是个小不点儿，躬逢其盛不可错过，抱着他上了蛇山，与黄鹤楼留下最初的影像。

有趣的是，1986年秋，一群大学同窗游玩阅马场，在“和平鸽”喷泉前合影。照片洗印出来，发现我居中坐在围栏上，无意将黄鹤楼“托”在了肩头，多了一份惊喜。

此后，与黄鹤楼多有亲近，陪同父母游黄鹤楼，接待亲友游黄鹤楼，当了记者采写黄鹤楼，退休后带着孙女游黄鹤楼……武



汉人，有几位没与黄鹤楼“同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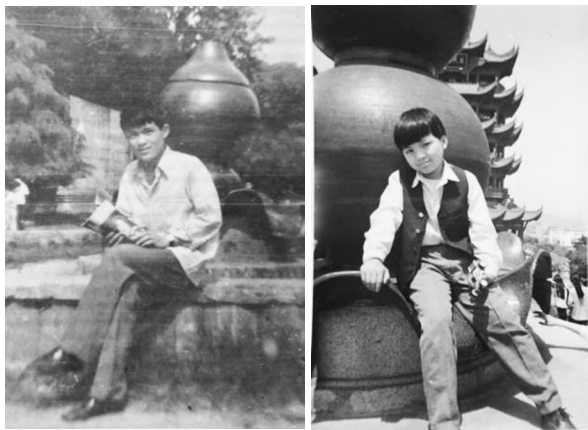
一个人的黄鹤楼留影史，也许就是黄鹤楼纷飞的花絮。

说来叫人不信，在黄鹤楼重归之前，我与黄鹤楼就有过亲密接触。那是1972年上高中，历史老师徐力组织课外活动，到阅马场红楼讲“武昌起义第一枪”，上蛇山首义公园寻找当年的铁炮，顺路指点一处铜铸的紫黑色“宝葫芦”，说是老黄鹤楼遗落的宝顶，大家纷纷上前敲一敲摸一摸。1884年的那场大火片瓦不存，唯有宝顶扛过了烈火，随着风雨几经辗转，在兴建长江大桥时落户首义公园。

回家说与父亲听，他小时候竟然爬过这“宝贝疙瘩”，让我惊讶而更生兴趣。

1978年，借得一架照相机，约了一位高中好友重访宝顶，为它的流落留下一份影像记录，如今坊间也不多见。这张照片效果不大理想，但对它有所偏爱，不仅放大为四寸，还洗





印成茶色，点染一丝古意。

黄鹤楼重建，这个高约一丈、重达两吨的宝顶迁到黄鹤楼身旁，展现它曾有的沧桑。10年后的1995年5月7日，我请父亲、岳父二老同游黄鹤楼，特意让儿子与宝顶合影，好似父子两代接力，为它的漂泊与回归，给出一个完整的见证链。

值得插叙一段的是，我不仅与黄鹤楼宝顶邂逅，也与从黄鹄矶迁到蛇山头的胜像宝塔相遇。1977年春节，我已招工回城，约了仍在知青队的几位同伴上蛇山访古，从南麓的“三楚雄风”牌坊顺势而上，经黄鹤楼剧场来到胜像宝塔。我们三个男生胆大，觉得与塔座相依留影不够潇洒，竟然在众目睽睽下攀上去仰望长空。

后来得知，胜像宝塔由元代王子威顺



王所建，属于珍贵的密宗佛塔，1958年就列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不由为冒犯文物而汗颜。

一位总设计师的匠心坚守

1978年，当我尚在与老黄鹤楼宝顶合影时，一位38岁的建筑人已加盟黄鹤楼重建队伍，他是中南建筑设计院的向欣然，后任黄鹤楼重建总设计师。1994年，我这个38岁的武汉伢成为新闻人，关注黄鹤楼的重建历程，与向欣然开始交集。

三国吴黄武二年（223年）黄鹤楼始出，以“江南第一楼”标领千年风骚。然而，楼高耸危，命运多舛，应了那句“岌岌者易折”。1800年历史，重建27次，仅明清两代就有10次，史称“火经三发，工届八兴”。最后一座1868年重建，1884年焚毁，短短16年夭折。



“黄鹤知何处，剩有游人处”。人们爱黄鹤楼之切，每每将黄鹄矶遗址上的警钟楼、现今黄鹤楼处的奥略楼，误为黄鹤楼。1957年，长江大桥飞架龟蛇二山，黄鹄矶立起武昌桥头堡，警钟楼及沿线的奥略楼一并让道，胜像宝塔也迁到现址。

1957年9月，毛泽东视察即将通车的

长江大桥，明确对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表示“一定要重建黄鹤楼”，此后多次过问进展，强调“应该修，这是历史古物”。

没有黄鹤楼这座历史古物，武昌称“白云黄鹤的故乡”就徒有其名，对不起家乡父老，对不起天下游客。

新中国成立之初，尽管百废待兴，黄鹤楼重建列入议程。

1951年6月17日，中央下达指示查勘修葺名胜古墓，武汉市文化局立即着手调查黄鹤楼景区及邻近明代陈友谅墓的现状。1956年7月27日，武汉成立黄鹤楼重建委员会。1957年，大桥工程局拨出16万元，铁道部增拨80万元，资助黄鹤楼重建。

1958年6月30日，全国城市规划工作座谈会在青岛举行，武汉市城建委副主任鲍鼎带去黄鹤楼设计图纸，会议特别安排一天讨论，梁思成等著名建筑学家认可重建地址和轮廓形式。

1959年10月31日，武汉市决定修建黄鹤楼、晴川阁、琴台三大古迹，列为1960年国庆献礼项目，但遭遇“三年特殊困难”而搁置。

1970年，黄鹤楼重建再次进入轨道。1975年12月27日，武汉市委根据市文化局的方案，决定黄鹤楼按“清式楼”重建。

1976年6月3日，武汉市委批准成立筹建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1978年5月，黄鹤楼重建开始征集方案。各路建筑设计师群雄逐鹿，最后中南设计院7号方案胜出中标，出自向欣然之手。据说，这一方案原是主方案的附件“补充方案”，用以比较和说明，却“反客为主”被一眼相中。

1980年，重建工程初步启动，随后又因“经济过热”压缩楼堂馆所而暂停。筹建领导小组办公室心有不甘，打报告要求保持运行。1981年4月4日，湖北省省长韩宁夫果断批示：“同意‘黄办’意见，设计班子不散，给点经费，做点准备工作。”半年后的10月22日，重建工程终于破土。

1982年11月，中共武汉市第六次党代会决定，将黄鹤楼重建列入“全市五年内要办的十件大事之一”。

黄鹤归来指日可待，向欣然全力一搏。

向欣然并非“老武汉”。他是浙江镇海人，1940年出生，1950年来汉，从宁波小学到文华中学，青少年的黄金时期在汉口、武昌度过。1957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1963年毕业分配到中南建筑设计院，与武汉续缘，为自己圆梦。

任何成功都不会偶然，有一个“段子”



向欣然在黄鹤楼重建工程施工现场

不乏精彩：1981年5月4日，分管城建的市场领导王杰，召集讨论黄鹤楼重建工程开工，见到年纪不大、衣着随便的向欣然，不大相信他是总设计师，单刀直入发问：“建黄鹤楼你有没有把握？”

向欣然一语惊人：“搞不好黄鹤楼，我就去跳江！”

一问一答，貌似江湖传说。若干年后，我分别采访王杰、向欣然二位，证实此言不虚。王杰笑呵呵地称向欣然“艺高人胆大”，向欣然一脸无奈说“自己逼自己”。

“搞不好黄鹤楼，我就去跳江”，无异于立下军令状，颇显武汉人的爽劲和担当，反映了向欣然的义无反顾。很难想象，在那个没有电脑绘图的时代，150多幅建筑施工图全凭“自己逼自己”，以一人之力手工绘制。不仅如此，他还手绘一系列黄鹤楼效果图，形象化为施工服务。

审查建筑方案时，湖北省省长韩宁夫又发问：“将来盖起的房子，有没有你画

的那么漂亮？”向欣然回答：“肯定实物漂亮，因为中国古典建筑有许多细部，是效果图无法体现的。”于是，会议当场批准建筑方案。

2017年，向欣然出版《建筑师的画》一书，湖北美院院长唐小禾为之作序，从专业角度赞叹不已。

2021年2月22日，向欣然在上海去世。23日，我的日记留下这么一行：“黄鹤楼重建总设计师向欣然，享年81岁逝世，报道公布他所作绘图绘画，一瞻其专业的认真执着。”



向欣然手绘黄鹤楼

4月26日，黄鹤楼缅怀总设计师，采取了在黄鹤楼美术馆举办“向欣然作品回顾展”的方式。展标“匠欣”二字极简，既与“匠心”谐音，又融入总设计师的大名，表达了无言的致敬。三个主题展区，62件手稿，完美诠释“一座楼的前世今生”“一个人的匠心坚守”“一座城的文脉传承”。

向欣然对黄鹤楼的贡献，远远超越一位建筑设计师的范畴，他认为黄鹤楼不只是一座仿古建筑，而应是一个专题性历史文化博物馆。从这一高度出发，他致力于系统规划黄鹤楼公园，重塑周边人文景点，综合起来展现黄鹤楼的千年历史深度。

1999年，向欣然与历史学家冯天瑜等

主撰的《黄鹤楼志》出版。2000年，向欣然完成黄鹤楼最后一个大型景点“吉祥钟”，才一了心愿退休。

就在此文截稿之时，偶尔在大智路地铁站撞上了黄鹤楼，细看它是武汉地铁集团的企业文化标识，四个大字“匠筑不凡”传递匠心，也铭记我们城市不凡的奉献者。

一次征文活动的文化传播

1994年秋，黄鹤楼即将回归10周年，我已调至长江日报周刊部负责《长江日报周末版》一版，与资深编辑王志远一起采访武汉市园林局副局长兼黄鹤楼公园管理处主任詹林，选择海外华人游览黄鹤楼的角度，以“中秋月”彰显“中华情”，合写《故乡明月在 朗照彩云归》，在国庆节当天刊出。

这篇特稿反响不错，詹林委托《长江周末》策划黄鹤楼重建10周年的庆典报道，那么采访总设计师向欣然唱一曲重头戏，乃是题中之义，也再好不过。在黄鹤楼下的紫竹院面晤，向欣然却不大赞成老是“朝后看”，提出要多多传播黄鹤楼承载的城市文脉。

黄鹤楼重建的前前后后

□ 向欣然

黄鹤楼重建落成已整整十年了。我作为工程的主要设计人，从亲身经历中，深深感受到黄鹤楼的建设牵动了多少人的心——从省市领导到平民百姓，从专家学者到普通工人，从“湖北佬”到外乡人，无不倾注着关怀和爱心。

我们这次重建从1978年正式开始，一直在省市两级政府领导下进行。省里的几位主要领导人曾多次听取设计工作的汇报。1980年的一次设计方案审查会上，陈少敏省长问我：“将来盖起来的房子有没有你图上画的那么漂亮？”我解释道：“实物比之图纸漂亮，因为中国古典建筑有许多细节，是效果图所无法表现的。”就是这次会议，审定

批准了黄鹤楼的建筑方案。

1981年下半年黄鹤楼破土动工，有关设计和施工的具体工作就由当时市里的王书记直接来抓。他几乎每个星期都到山上召开工程协调会，并爬到高高的脚手架上查看施工情况。那时我刚40岁出头，感到王书记似乎对我太放心，于是在一次协调会上慷慨陈词：“搞不好黄鹤楼，我就去跳长江！”想不到从此后，我和王书记就成了好朋友。

黄鹤楼的设计得到了国内不少著名建筑专家的热心帮助。华南理工大学的龙非教授要我们认真参考清代黄鹤楼的形式，说“清楼的形式在中国建筑史上是一个孤例，很有特色”。中国近代著名的老一輩建筑家杨廷宝先生，建议黄鹤楼的斗拱不要采用正统的官式做法，要有南方的特

点。最有意思的是，我在北京故宫园林专家韩惠生家中请教古建筑施工，他不但毫无保留地传授知识，而且一日还管管饭，令人感动。当然，一些专家对新一代的黄鹤楼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一时也拿不准，有反对采用复古形式的，也有主张在顶层设旋转餐厅的，这些意见都反映了他们的一片热心。

黄鹤楼的施工需要熟悉古建筑的施工工匠，这样的人在武汉市并不好找。杨家巷老师傅已经退休，此时再度出山为黄鹤楼放样，成为名副其实的掌墨师傅。他说这是“今生一大幸事”。工人师傅们14年施工的辛劳自不待细说，他们所要的“回报”，就是让他们作为黄鹤楼的第一批参观者。

随着黄鹤楼的脚手架越来越高，现场围观的老百姓也越来越多。一天傍晚，我见到一位本地老老在对外地人“吹牛”，说新黄鹤楼与老黄鹤楼一模一样，就是比老楼的更高、更大。其实他肯定没有见过图纸，但自豪与骄傲的心情溢于言表。我不禁深受感动，因为黄鹤楼在每个人的心中。



情系黄鹤楼 有奖征文
黄鹤楼重建开放十周年

“情系黄鹤楼”征文启事

誉满海内外的“江南三大名楼”之一黄鹤楼，今年6月11日将迎来它重建落成10周年庆典。

盛世造楼，胜迹系情。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武汉市黄鹤楼公园管理处与本刊联合举办“情系黄鹤楼”征文。

征文内容：围绕黄鹤楼（含黄鹤楼遗址、复建史实）与黄鹤楼有关的人物、故事，可写名人游踪，可据传说史实，可记

登楼趣话，可据重建轨迹，可怀故地旧事，以康乐、康见、康闻为要。

征文要求：真情实感，内容真实，文风朴实，以一稿一投为原则，注重情节和可读性，篇幅在1000字左右。征文结束后，将评出一、二、三等奖若干名，颁发奖金和证书。

征文时间：1995年3月—6月。来稿请寄武汉长江日报路长江日报周刊部（邮编：430015），信封上请注明“情系黄鹤楼”字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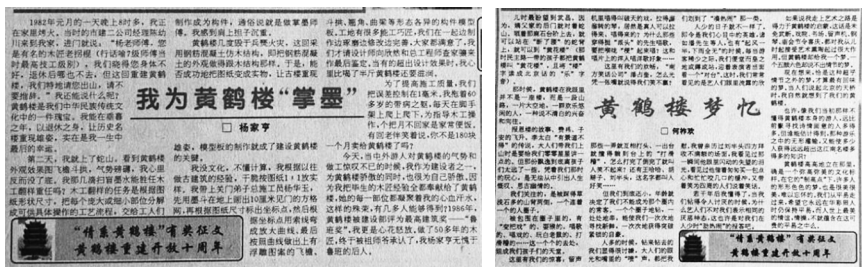
为此思路一变。1995年1月10日日记载：“上午冒雪去黄鹤楼管理处，赵主任（周刊部主任赵振宇）让我主谈‘黄鹤楼10年’的庆典报道。我提出组织专版，开展‘我与黄鹤楼’征文和‘古今辉煌’摄影作品大赛的设想。”双方一拍即合，过完春节没几天，2月12日我和赵主任、黄鹤楼公园宣传干事江煌一行赴京，联系《人民日报海外版》和《新闻出版报》，寻求首都舆论的支持。2月24日和3月4日，两报分别刊发“情系黄鹤楼”征文的消息。

“盛世造楼，胜迹系情”——征文旨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内容扣住“寻名人游踪、掘传奇史实、记登楼趣话、探重建轨迹、怀故地旧事”，从3月开始到6月结束，引发一波热潮。

当然，我们坚持征文由总设计师开篇造势。3月3日，向欣然《黄鹤楼重建的前前后后》与“征文启事”一同刊发，拉开序幕。

向欣然的回忆，除了“跳江”之外说





自己不多，倒是特别感佩外地三位前辈专家不遗余力的专业指点，其中提到“在北京古建园林专家韩惠生家中请教古建施工，他不但毫无保留的传授知识，而且一日还管两顿饭，令人感动”。他讲到施工缺少熟悉古建筑的能工巧匠，“杨家亨老师傅已经退休，此时再度出山为黄鹤楼放样，成为名符其实的掌墨师傅”。文章结尾，他又高度赞扬朴实工人们的四年艰辛劳作，说“他们所要的‘回报’，就是让他们作为黄鹤楼的第一批参观者”，至今读来依然动容。

有了问欣然领衔，征文来稿纷飞。第二篇刊出诗人曾卓的《回忆黄鹤楼笔会》，再现1985年4月黄鹤楼落成又未开放之际，来自全国的文化名人成为“第一批客人”的火热场景。曾卓不惜笔墨，开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公木、阮章竞、邹荻帆、绿原、萧乾、李普、严辰、苏金伞、宗璞、罗工柳、杨筠、秦兆阳、黄钢、黄裳、端木蕻良、钟耀群、黎丁等”，皆为著名作家、诗人、画家、报人，难得一时之盛。

在武汉，诸多文化名流应征。书法家吴丈蜀、楹联学家白雉山曾为黄鹤楼题匾撰

征文吸引了更多的市民百姓。向欣然文章中提到的老师傅杨家亨，请他来了一篇《我为黄鹤楼“掌墨”》，这位七级“木匠老拐棍”，为把“毕生木匠经验全部奉献给了黄鹤楼”而深感骄傲。此文评上一等奖，高于总设计师的开篇大作。还有《两代人的情怀》《没有尽头的漫步》《京城老乡“黄



鹤情”》《电话磁卡上的黄鹤楼》《“黄鹤雄文”与一位老者》等，从标题便可以看出，“情系黄鹤楼”跨越时空贯通古今。

《人民日报海外版》格外给力，文化部主任熊光荣年过半百，是我们湖北潜江人，笔名“湖北子”，以浓郁的家乡情结，经手转载了好几篇征文文章。征文行将结束的6月9日——黄鹤楼重建开放10周年的头一天，我采写的特稿《名流荟萃黄鹤楼》在《长江周末》一版刊发，7月12日又由《人民日报海外版》转载。

《名流荟萃黄鹤楼》刊发了两幅图片，一幅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在市长赵宝江的陪同下参观黄鹤楼；一幅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的题词“把白云黄鹤的故乡建设得更美好”。

“情系黄鹤楼”征文活动，实现了向欣然传播黄鹤楼文化的初衷，大家都欣然。其间，轰动全国的行为艺术“大地走红”慕名来到黄鹤楼，我们及时纳入征文活动，助力黄鹤楼扩大影响。

再次与向欣然见面，时隔19年，也有一点巧合。2013年，我在长江日报集团党委班子分管长江传媒大厦建设，市有关部门委托专家组评审设计方案，我作为业主单位代表走进会议室，一眼看到向欣然坐在组长席主持评审，一时有些泪目。他已年过古稀，我也年近花甲，待他总结发言一锤定音签字后，上前只顾握手致谢，来不及回忆往事，也没想到拍一个合影。

往事穿越，转眼2015年，又是黄鹤楼重建开放30周年。《武汉晚报》发起“寻访黄鹤楼老物件”活动，我意外发现家中一床“毛巾被”上，竟有一座黄鹤楼。岁月，就是如此温情。



“毛巾被”其实是一幅1992年挂历，名曰“武汉风光”，由六条毛巾构成，一条毛巾一处江城名胜，第二条黄鹤楼上印着三、四两个月的日历——正是春意盎然时节，胜像宝塔守护着黄鹤楼，两只黄鹤从楼顶飞过。

毛巾挂历为何变为“毛巾被”呢？一年日子过去，挂历随之成为废品，但这幅挂历独特而难以割舍，妻子用缝纫机拼成一条“毛巾被”。不知怎的，碰巧就从柜子深处翻了出来，给黄鹤楼奉上一个“老物件”，虽是流影斑驳，恰如时光积淀。黄鹤楼回赠一套纪念书签，又邀请重游黄鹤楼。这次，我们老两口牵上3岁孙女的小手同行——与黄鹤楼的情缘，真是圆满如中秋之月。

如今，黄鹤楼重建归来40周年，央视蛇年春晚在黄鹤楼设立武汉分会场，“白云黄鹤”跃然荧屏，走向五大洲四大洋……

罗建华，长江日报高级编辑

以“小信息”写好履职“大文章”

◇ 汪东华

人物名片：汪东华，民建武汉市委常委、硚口区委副主委，市民建科技与健康委员会主任，武汉市政协委员。

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和提交提案是参政议政最为普遍和常见的两种形式，是民主党派成员履职的重要载体，也是连接基层诉求与政府决策的重要纽带。如何将看似细碎的“小信息”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大文章”？

2014年，在民建湖北省委副主委韩民春的推荐下，我加入了民建。从我11年的履职实践和体会来看，通过精准选题、深入调研、创新机制和多方联动，将医疗健康、养老服务、基层治理等领域的民生“痛点”转化为系统性政策建议，得以展现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和提交提案工作的实效性与影响力。

扎根基层：从“小切口”捕捉真问题

社情民意信息和提案的生命力源于对基层需求的敏锐洞察。我始终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等方式，从具体案例中提炼共性问题。

在参与医疗行业调研时，我惊愕地发现医疗器械超适应症使用现象泛滥，就像一颗颗潜在的“医疗地雷”，严重威胁患者安全，还造成医疗资源的巨大浪费。走访多家医疗机构后，目睹不少医生因对医疗器械适应症了解不足或为追求便利超范围使用设备，而患者对此毫不知情。

为破解这一难题，我深入研究相关政策法规，结合调研数据，撰写了《关于带量采购背景下对武汉市医疗器械进行分类管



参加市区政协社区医疗卫生队伍建设专题调研座谈会

理的建议》提案。建议建立医疗器械分类监管体系，根据不同风险等级和用途精准监管，同时强化临床使用培训，确保医护人员熟练掌握医疗器械的正确使用方法。这一“小切口”的提案被武汉市医保局当年现场办理，并纳入医疗器械管理改革议程。

面对老龄化社会背景下失能老人护理难题，我深入社区和医疗机构调研，不少失能老人因缺乏专业护理人员照顾，生活质量堪忧，家庭也陷入困境。

我家邻居张阿姨，她母亲80多岁，失能卧床多年，全家为照顾老人身心疲惫。虽知晓长护险，但因护理员稀缺，服务申请后长时间未落实，张阿姨只能辞去工作全职照顾母亲，家庭经济负担加重。

调研中我发现，护理人员短缺是制约长护险制度落地的关键瓶颈。基于此，我提出“基层医疗机构转型+订单式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建议将闲置的一二级医院转型为护理机构，并与高校合作定向培养护理人员。这一提案引起相关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为武汉市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

“推行主动健康奖励积分制，赋能基

层慢病管理”是我的另一份提案。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慢性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压力变大。为了缓解这一矛盾，我提出推行主动健康奖励积分制的建议，激励患者积极参与健康管理，减轻基层医疗机构的负担。这一提案在《长江日报》等媒体刊登，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针对现在子女抚养成本，特别是3岁以前婴幼儿托育服务

成本居高不下的现状，我发现许多双职工家庭都有托育需求，但另一方面，现有托育机构却面临招不满员的问题。我在实地走访一些地区后找到问题症结：目前托育机构大多数是民营的，而公立机构相对较少。

为此，我建议政府加大对普惠性托育机构的投入力度，通过新建、改建、扩建等方式增加托育服务设施，满足家庭多样化的托育需求。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托育服务体系的建设，通过政策扶持、税收优惠等措施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托育领域。2025年两会期间上了热搜，被各大媒体报道转载，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精准聚焦：以“小建言”推动大改革

社情民意信息和提案的价值在于其精准性与前瞻性。我善于从行业趋势和社会“痛点”中提炼议题，通过数字化思维推动制度创新。

我曾因咳嗽伴有低烧，前往家附近的公立医院就诊，医生让做血常规、拍胸片，结果显示一切正常。但几天后症状并未缓解，于是我去另一家医院问诊，却被要求重



调研青山社区医院，家庭医生个性化签约

新检查，理由是不熟悉之前的检查结果。我只能再缴费、再排队，又做了一遍检查，结果和上次几乎一样。

还有一次，我因肠胃不适去一家三甲医院做胃肠镜检查，过程痛苦且费用高。后续转至另一家医院治疗，又是要求我重新做胃肠镜，理由是不了解之前的检查过程和结果是否准确。这让我对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困扰有了深切体会。

很多医院都搭建有平台，可以实现本院检查检验结果一键查询，为什么各医院之间不能实现检查检验结果互联互通互认？带着疑惑，我探访发现，目前在医院层面有顾虑：一是临床检验及诊断标准不统一，一些医院对外院的检验质控不信任；二是担心产生医患纠纷难以明确法律责任；三是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收益。

针对医疗检查结果互认难的这一顽疾，我提出构建全市统一的电子病历系统，实现诊疗数据“一卡通”，并建议在医联体内打通远程诊断、影像共享等业务。某种程度上这一提案推动和加速了武汉市公立医院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进程，减少了重复检查带来的资源浪费，惠及数百万患者。

在医疗服务数字化领域，我敏锐地聚

焦到“云胶片”推广问题。“塑料袋+传统胶片”是很多人上医院的标配，CT、磁共振等影像报告不仅需要等待领取，复查时还得都带上，想扔又不敢扔，不扔又占地方，丢了还得重新拍……

传统医用胶片成本高、易损毁，而“云胶片”利用数字化存储可大幅提升效率。我通过提案呼吁全市医院普及这一

技术，并配套完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机制。该建议被多家主流媒体报道，目前各大医院已经逐步实施云胶片服务，促使武汉市医疗行业加速数字化转型，仅胶片成本一项每年可节约数千万元。

关于武汉市开通零售药店“互联网+医保购药”的提案，是我在2024年的一项重要履职成果，被市政协评为“优秀提案”。这缘于我的一次感冒，因工作太忙没时间去医院或药店，就在网上搜了一下能不能线上购药。结果发现虽然可以买到药，但不能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只能自费，这让我觉得有点遗憾，因为医保卡里有钱用不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已经让很多服务实现了线上化，支付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医保支付却在这方面进展缓慢。

后来，我看到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尝试医保个人账户线上购药的报道，这让我眼前一亮。如果能以提案方式建言在本地也开通医保个人账户线上购药功能，那该有多好。于是我当即撰写、提交了相关提案，并在立案后主动联系调研提案承办单位。这一提案得到省、市医疗保障局的高度重视，经过上下共同推动，武汉将成为全省首个医保个人账户线上购药试点城市。

机制创新：用“小平台”激活大协同

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和提交提案的工作成效，离不开沟通机制的创新与多方协同。我在履职中注重搭建常态化对话平台，例如建议武汉市医保局建立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医疗机构、药企等的定期沟通机制，推动政策制定更透明、更贴近实际需求。

此外，平时积极参与跨部门协作，如在华中科技大学公共事业管理（医）专业教学改革中，推动医学院与医疗机构、医保部门合作，将行业实践融入课程设计，为医疗管理人才培养注入实战经验。

在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中，通过专题调研探索社会资本参与模式。针对武汉市首个社会资本参与的常四社区改造项目，提出“财政引导+市场运营”的可持续方案，强调通过商业服务嵌入、公共空间运营等方式实现资金平衡。这一思路被纳入江汉区老旧小区改造政策框架，为破解资金难题提供了新思路。

我母亲86岁，本身就有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和定期检查。有一次，我母亲突感身体不适，想找个医生咨询一下，就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看有没有家庭医生可以签约。结果工作人员告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有，但来签约的人不多，好多居民都不知道有这项服务。

2023年武汉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居民知晓率和利用率低于全国标准，存在家庭医生特别是全科医生数量不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居民提供的签约服务针对性不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支持性政策不到位等问题。

为此我建议构建以基层医疗机构为基础的卫生服务体系，大力推进家庭医生团队开展个性化签约服务，根据不同服务人群需求设置签约服务包，实行打包服务。大力推进基层医疗机构预约就诊和智能分诊，引导居民逐步养成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首诊的就医习惯，减少医疗资源挤兑现象，打造高质量全科医生团队并提升其服务能力建设，充分发挥居民“健康守门人”作用。

还有一件令人欣慰的事，在市政府2025年1月8日发布的《武汉市加快生命健康产业突破性发展 打造国际医疗创新高地实施方案》中，我的建议得到采纳。我提出，创新要在医疗技术、医药研发、医疗器械、医疗服务等领域着重发力。在医工交叉领域，创新的关键在于理解临床需求并将其转化为技术创新。未来可借鉴武汉同济产业科创中心的成功模式，推动医工复合型人才培养，促进医教产学研协同创新，建立联合实验室和研发中心，为推动武汉医疗行业的创新发展提供宝贵的思路。



全国政协第154期地方政协干部（委员）培训班留影

长效赋能：以“小支点”撬动大体系

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和提交提案的深化需要制度化保障与持续性跟踪。我注重提案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从问题发现、方案设计到落地反馈形成闭环。

我之前生病去大医院看病，发现挂号难、候诊时间长，而社区医院的医疗资源却相对闲置，医疗资源分布不合理。经了解国家一直在推行医生多点执业政策，就想着能否通过提案来推动这一政策更好地落地实施，以缓解大医院的就医压力，同时让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水平得到提升。

在充分调研和了解医生多点执业现状以及群众就医需求等情况后，我撰写了关于医生多点执业的政协提案，提出规范执业流程、完善考核机制等建议，还持续跟踪政策执行情况，推动建立执业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细则，确保政策既放得开又管得住。

我长期聚焦武汉医联体建设，通过深入调研提出多项创新建议，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与分级诊疗体系完善。2023年6月，我带领课题组赴协和武汉红十字会医院和武汉市第八医院调研“1+1+12”紧密型医联体模式，发现该模式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了远程会诊、影像共享和双向转诊，四年间惠及大量市民。但医联体内患者数据尚未完全互通，基层医生难以调阅跨院诊疗记录，导致重复检查等问题。我在2024年武汉两会上建议加强分级诊疗平台建设，构建全市统一的电子病历系统，实现诊疗数据“一卡通”，并制定远程会诊转诊标准，优化医生激励机制。



2023年武汉两会期间接受媒体访谈

此外，我参与武汉市红十字医院医联体评估项目，提出分级诊疗需“转变思想观念、优化就医体验、创新管理模式”三大路径，推动托管成效科学评估。《关于以信息化促进医联体建设的建议》被相关部门积极吸纳，助力武汉打造“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服务体系，加速医疗数字化转型和分级诊疗进程。

自加入民建以来，我多次被评为全国、省、市、区“优秀民建会员”和“参政议政先进个人”，同时被评为2024年度优秀市政协委员。多年的履职实践表明，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和提交提案工作绝非简单的“问题反映”，而是需要以系统性思维将微观案例转化为宏观政策。

通过“小信息”的精准捕捉、科学分析和推动落地，用心、用情、用力去解决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既有助于解决具体的民生问题，又能推动制度创新与行业变革。这种“见微知著、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为新时代民建会员履职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唯有扎根基层、聚焦实效、协同创新，才能真正将“小信息”书写成服务大局的“大文章”。

1988年，张光年到访“武赤壁”

◇ 李城外

1995年9月15日，我在北京采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先生，请张老回忆“文革”期间下放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的生活。

82岁高龄的老人温文尔雅，和蔼可亲。访谈临近结束，我补充说：“张老，黄河已与您的笔名‘光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向阳湖，也是您永远忘不了的！”他欣然点头，笑道：“对，都忘不了！一河一湖，有河有湖，都是水！”

听了张老的回答，我心想，咸宁境内的名胜“赤壁”和张老笔下的“黄河”岂不是一联妙对吗？于是又问张老，在干校时是否得空到赤壁三国古战场一游？老人说，当时自己是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对象，行动不自由，作为一位出生于湖北的诗人，对近在咫尺的赤壁虽向往已久，却未能前去一访。

直到1988年10月中旬，他才有机会重返向阳湖，参观干校旧址，顺道游览赤壁古战场，了却一桩多年的心愿。当时他在日记中还详细作了“备忘录”。

后来的几年间，我又先后两次上门拜望张老，并托他的秘书、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原副主任吴桂凤，为我找到一本群众出版社出版的《江海日记》（1996年1月版）。该书第一辑收录《江汉日记》，其中第四部分题为“行进在江汉平原上”。1988年10月16日日记中，张老记叙了游览赤壁的详细经过：

昨天的计划，原定是咸宁干校旧址参观后，径去洪湖市。在向阳湖逗留两小时，辞别后经过一段难走的公路，下午五时许到蒲圻市，受到上届市委万副书记、市委办公室沈主任的盛情接待。晚餐后难于上路，便



作者采访张光年先生

在蒲圻住下。沈主任向我们介绍，说蒲圻有许多可看的地方，特别是三国赤壁。我们便定于今天上午游览赤壁……

上午八时，万书记陪我们一行参观市西北四十公里的三国赤壁。湖北长江边有两赤壁：在黄州的曰文赤壁；在蒲圻的曰武赤壁，这才是当年吴蜀联盟火烧战船大破曹军的真赤壁。自宋代苏东坡轻信传言，张冠李戴，写出震古烁今的杰作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天下传诵，后代诗人，唱和不绝，致使蒲圻赤壁为诗名文名所掩。古迹年久失修，光顾者反不若前者之多了。

我们沿石阶下到江边，看石壁凌空高耸的壮丽景色；又拾级攀上峭壁。当年周瑜在这里设立的指挥部，如今只剩下一片荒草，仍然可从这里俯瞰浩浩大江东去。想见当年曹操水师中计，顿时灰飞烟起，火光冲天，照见沿江石壁一片通红的情状。主人邀请登山游览望江亭、拜风台等胜迹。因为刚才下阶上阶各约三百级，有点儿累了，只能抬头仰望一眼，改日再来细看。这时，从对面洪湖码头开来的渡船即将靠岸，旅行车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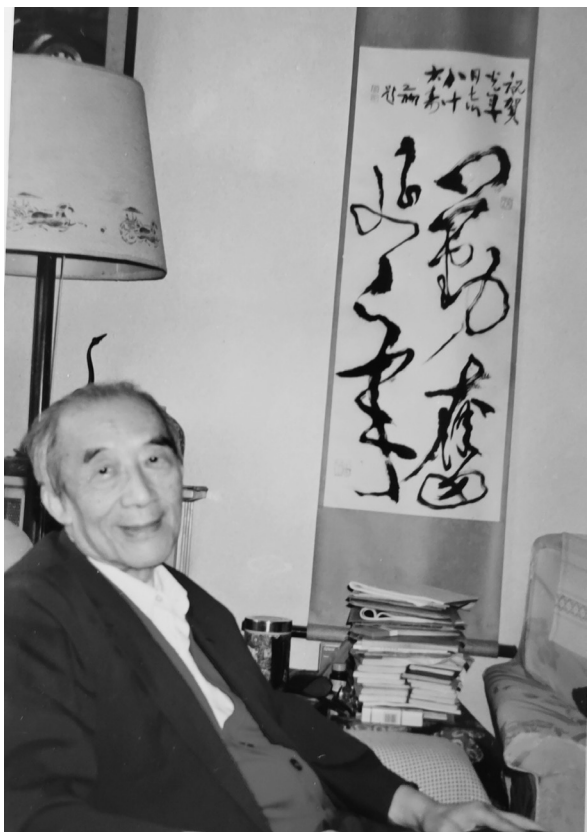
开上渡船。我们便辞谢蒲圻市同志，登船向洪湖驶去。

临行前，万书记等对我说，这里是真赤壁，三国遗迹不少，却年久失修，是一大憾事。市里有初步规划，想把这里辟为旅游点，因省里和国家文物单位意见不一致，迄今未能实现。我想，在日本、朝鲜和东南亚一带，人们对《三国演义》及三国遗迹是很感兴趣的。在鄂北，在江汉平原，包括蒲圻赤壁在内的三国遗迹，所在多有。

如果花钱不多，不求华贵，在当代史学家、文学家、书画家、建筑家的帮助下，互相配合，逐渐系列地开发建设起来，吸引国内外客人作三国胜迹几日游，对于促进这一带经济文化的繁荣，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我知道今后两三年国家财经困难，暂时无力及此。这意见当时并没有表示出来。

张老有所不知。早在1981年12月，赤壁便被列入湖北省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令人欣慰的是，时隔十多年，张老的心愿已得以实现。如今那里新建了巨型周瑜石雕像和赤壁大战陈列馆等多个新景点。1998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蒲圻市正式更名为赤壁市。昔日古战场和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陆水湖连成了旅游线，该市正在向湖北旅游名城迈进。

2003年初，因主编《咸宁文史资料·三国赤壁文化专辑》，我萌生了为张光年先生赤壁之行“存史”的念头，于是专门再去赤壁实地考察，还采访了昔日省市陪同张老的有关同志，如时任湖北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的洪洋等，他们的回忆与张老的日记完全吻合。



张光年先生在书房

据洪洋介绍：

“当年，因光年同志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又是中国作协领导、全国著名诗人，他偕夫人黄叶绿来湖北，参加抗战演剧队建队五十周年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在汉受到省领导的接见。省里并安排我陪同张老考察咸宁、荆州、宜昌及老河口等地，省接待办派了专人专车随行。

我们于15日上午九时许离开东湖宾馆翠柳村，去咸宁参观向阳湖以后，当时的地委副书记胡永继提议去蒲圻住一夜，张老也很想看看赤壁，因为他不仅熟悉三国故事，有浓厚兴趣，而且知道对赤壁古战场遗址究竟在哪里仍有争论。第二天是星期天，阴天。参观赤壁的人不多，张老兴致很高，谈笑风生，并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他对此此次湖北之行是满意的，回京后

将日记整理出来，定名为《江汉日记》。因我当时兼任《长江文艺》主编，正好向张老索稿。他把日记分几次寄来，我刊连载了好几期。张老还特地提出每期多寄他几十册，以便送给朋友。”

赤壁行三天后，张老去沙市参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清晨想起赤壁之游，在盥洗室得句，成小诗《三国赤壁》。近年旅行中的诗句，常常是在清晨枕上或盥洗室中得出来。这是因为清晨睡足了，头脑清醒的缘故吧。”

这首小诗是一首七绝，后来收入《张光年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诗曰：

“东坡居士念奴词，千古风流绝唱诗！
奈何轻言‘人道是’，从此长江两壁赤？”

身为著名文学家，张老的这首《三国赤壁》却明白如话，风趣幽默。诗人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大胆以苏轼为调侃对象，为三国赤壁文化增色不少。我以为，这也称得上是一段佳话，亦值得至今仍坚持武赤壁“黄州说”的学者们做一番反思。

至此，我联想到著名翻译家王以铸先生在于校时写的一首《记梦游赤壁》，摘录几句：“欲往阻舟车，未能到赤壁。赫赫古战场，咫尺空相忆。忽得梦中身，驻马江头驿。行歌吊古人，按图索陈迹……”我们不妨将它视为对张光年先生“赤壁情结”的一个补注。虽然张老已于2002年1月28日去世，但他的武赤壁之行和七绝诗，将长留鄂南人民的记忆中。

李城外，咸宁市政协原副秘书长

助推武汉“年轻一代”破茧成蝶

◇ 杨 宵（口述） 章旷怡（整理）

人物名片：杨宵，市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青年企业家委员会委员，武汉市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协会会长，湖北腾途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魔法灯国际集团澳新直邮集合仓创始人。

父辈教会我坚韧，而传承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需要以这份力量为起点，去探索更广阔的天地。接手家族企业的这十余年，在坚守主业的同时，我创办了体育产业和跨境电商，将父辈事业扩展到更多领域。自2019年起，还带领着武汉“年轻一代”协会的伙伴们，在疫情中逆行运送物资，走进山区小学为孩子们点亮希望。如今，武汉“年轻一代”正如破茧的蝶，用翅膀丈量未来的高度，在磨炼中蝶变为真正的新时代青年企业家。

接班人的破局之路

我父亲是典型的武汉“创一代”企业家。1985年，年仅22岁的他从汉正街批发零售服装鞋帽起步，一家家店铺扩张，把生意做到全省甚至省外。90年代初，他抓住商业地产的机遇，在武汉核心地段购置商铺。那些年，武汉的街道寥寥无几，父亲像“捡贝壳”一样，在红钢城、司门口等步行街买下半条街的商铺，成为家族企业最坚实的后盾。2004年，他又敏锐地转型酒店行业，创立坡地连锁酒店。当时武汉几乎没有经济型酒店的概念，父亲从国外引入标准化的管理模式，短短三年开出七家分店，成为本土品牌的标杆。

父亲从没逼我接班，但我心里明白，

他一直盼着有人能扛起这个担子。慢慢地，我也发现，责任和梦想其实可以并存。2006年填报志愿时，我报考了武汉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人生轨迹就此改变。

大学四年，我的寒暑假几乎全“泡”在家族企业里。我从前台收银员做起，戴着工牌和普通员工一起打卡上班。最难忘的是2007年寒假，临近春节，公司人手紧张，我主动申请值夜班。除夕夜独自坐在酒店前台，听着窗外的鞭炮声。那些年，我在酒店轮岗超过10个岗位，从客房服务到采购管理，甚至学会了修理漏水的水管。这些琐碎的经历，成了后来我管理企业时最扎实的底气。

2010年，我从美国留学归来，父亲直接将我“扔”进公司管理层，没有交接仪式，没有手把手指导。从我进公司的第一周，父亲便没有再参加过公司集体例会。犹记得第一次主持公司例会的我，看着台下坐着的公司部门负责人和高管们，内心忐忑不安，感觉自己像个“不会游泳却被扔进泳池的孩子”，不断呛水、不断挣扎，也不断成长。

最难的并非业务本身，而是如何赢得信任，父亲的人脉不是我的通行证，自己的路必须自己闯。

2013年，我全面接手坡地酒店。彼时，经济型酒店行业竞争加剧，如家、汉庭等连锁品牌大举进入武汉。意识到死守传统模式只会被市场淘汰，我果断将酒店核心资产打包出售给7天连锁，回笼资金转型投资。随后我们聚焦商业地产和金融板块，入股湖北省铁投小额贷款公司，与国企合作开展合规化运营。截至目前，武汉市铁投小贷已成为全省前三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公司管理的商铺分布于武汉、上海、广州等多个黄金地段，发展稳步前行。



杨宵参加港路小学爱心行活动

跨界创业：在热爱中创造价值

作为企业的接班人，占有更多资源的我们比父辈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在顺应国家经济发展大势的情况下，更愿意在自己感兴趣的行业去投资。做生意不只为赚钱，更要创造价值。

父亲退休后，逐渐迷上马拉松，我们顺势成立湖北腾途体育公司，创办了全国首个马拉松培训中心，为省级田径裁判资格认证提供支持。每每看到父亲在国内外马拉松赛道上神采飞扬的样子，想到能为全民健身增添一份力量，便觉值得。

2017年，我的女儿出生。为寻找安全奶粉，我几乎踏遍了全球，但仍发现许多问题，最终决定自建跨境电商平台“魔法灯”。我们在澳洲、新西兰设立直邮仓，与当地品牌方直接签约，每一罐奶粉都配备溯源二维码。

创业初期，物流是最大难题。恰逢中澳关系波动，海关清关周期从7天拖到20多天。我和团队连续熬夜三个月，重新设计仓储动线，与菜鸟物流达成合作，最终将

效率提升至行业第一。2018年“双十一”，魔法灯创下全球跨境物流时效排名第一的记录，并连续两年亮相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汇聚江城新生代力量

2011年，市委统战部和市工商联联合创立武汉市新生代联谊会（现武汉市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协会），这是全国最早的民营经济青年组织之一。

彼时，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企业家逐渐退居幕后，他们的子女或接班、或创业，许多面临着理想与责任的矛盾，甚至因长期留学与国内环境脱节。“年轻一代”想做的，就是把这群“创二代”“海归”“青年创业者”聚在一起，用红色教育筑牢信念，用专业培训提升能力，用互助平台传递温暖。

对我而言，很小就明白一个道理：我们这些人接班就是一种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对企业的责任，也是对社会的责任。2012年，24岁的我初入武汉“新生代”，就跟随着市委统战部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从普通会员到副会长、秘书长，再到会长，我像一块海绵，在协会的每一次活动中汲取养分，获得成长。

二代企业家不缺钱，缺的是方向和认同。很多会员刚回国时“不接地气”，有的抗拒接班，有的与父辈关系紧张。协会的意义，就是让他们在这里发现自身价值，激发传承与创新创业的动力。

在与这些年轻会员们打交道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他们普遍都接受过非常好的教育，但在接班过程中常面临两个困境：一是对父辈创业史缺乏共情，二是对传统产业转



赴西柏坡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活动

型存在认知断层。这些年，我每年都会带领协会会员开展理想信念及创新科技培训，重走红军路，去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地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去杭州、厦门、香港等地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创新发展。这些经历让不少“海归”会员感慨：原来父辈的创业路，比我们想象的更难。

协会不是茶话会，做事得有规矩。正式接手协会后，我建立起针对领导班子可量化的考核制度，参与活动次数、捐款赞助项目等都被列入考核表中，采取计分制。这样每人在组织中的活跃度、热心程度一目了然，而没有承担起责任的领导班子成员会被“请”出理事会。

另外一方面，成立协会调解委员会，帮会员企业解决合同纠纷；开设中小企业服务站，免费提供法律和财务咨询。有位会员因疫情资金链断裂，通过服务站对接纾困贷款，如今企业已起死回生。这些事看似琐碎，却让协会成了大伙的“娘家”。

历经十多载风雨，协会从市级“四好商会”成长为全国“四好商会”。我们计划吸纳更多自主创业者，无论接班还是白手起家，只要心怀家国，都能在这里找到位置，收获成长。未来，我想带会员们走出去，与



武汉市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协会赴山区小学爱心行



全国青年企业家多交流，把武汉年轻一代“青春、活力、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播出去。

政协委员的民生情怀

在担任政协委员的三年里，我提交了15份提案，涉及经济发展、教育医疗、城市建设等多个方面。在政协履职中，我常常将眼光聚焦“小事中的大民生”。

我的第一份提案是关于武汉的非机动车道建设。调研中我们发现，80%的电动车车主抱怨“无路可走”，逆行、事故频发。我带着团队走遍武汉三镇，测量车道宽度，记录断头路、违停占道现象，还对比了杭州、厦门等地的慢行系统规划。

提案提交后，市公安局、城建局联合整改，三年新增非机动车示范路30公里，友谊大道等主干道隔离花坛缩减，骑行守法率提升40%。今年，我又呼吁“拆除快速路硬隔离带”，多次与交管局、规划院现场办公，最终在湖北大学周边增设出入口，优化了交通流线。

近年来，国内医疗体系挤兑的矛盾不断突出，不论是小病还是大病，广大群众都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去最好的医院，找

最好的医生，这无疑是一种医疗资源的浪费。

2023年，我提出《关于加快建设家庭医生及专业检测机构覆盖率的建议》提案，建议把医疗体系分层、分区、分块、分片管理。市卫健委迅速响应，全市组建34个医联体，700余名专家加入家庭医生团队，社区慢性病管理效率显著提高。

作为全国工商联青年企业家委员会委员、武汉市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协会会长，我带领着全市二代企业家及创业青年积极参政议政。目前，协会内担任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有10人，区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有200余人。

日常工作中，我常带领会员们去山区小学捐赠和帮扶。在红安县赵家河小学和通山县港路小学，我们帮教室换上了明亮的灯泡，修好漏水的屋顶。不限于简单的物资捐赠，我们还会陪孩子们一起做一些拓展游戏、观看无人机表演。想通过这些活动，打开山区孩子们的视野，让他们看见更辽阔的世界，在心中埋下希望的种子。

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我看到了更远的风景，也扛起了更重的责任。我们这代人，是年轻一代，也是勇于创新创造的一代，既能传承，亦能超越。

从菜薹到莲藕：我的乡村振兴共富路

◇ 冯 军

人物名片：冯军，蔡甸区政协委员，洪山菜薹产业协会会长，湖北菱湖尚品洪山菜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农业是根植于土地的产业，也是孕育希望的沃土。从洪山菜薹到蔡甸莲藕，从品牌打造到三产融合，我始终坚信：只有让农民成为产业链的受益者，乡村振兴才能真正实现。

生于乡土，情系农业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从小就对乡村有着深厚的情感。小时候，看着父母和乡亲们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水浸透衣衫，却依然难以摆脱贫困的枷锁。那时就在思

考：土地养活了人，可为什么乡亲们还是过得这么苦？

高考那年，我本有机会选择更“光鲜”的专业，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填报了华中农业大学。大学毕业后，身边同学大多进入高校和科研院所，而我却转身回到农村，成为一名“土里土气”的乡村追梦人。有人表示不理解，但我知道，农业的根扎在土地里，我的根也在这里。

起初，我在快速消费品行业做过销售，也尝试过其他工作，但心中始终放不下那个“农业报国”的梦。农业是立国之本，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这句话一直烙印在我的血液中，难以忘却。

2003年，我怀揣着满腔热情来到咸宁金沙洲，开始带领村民们种菜卖菜。可当时



北京新发地品鉴团到湖北优质农产品宝通禅寺洪山菜薹发源地考察

的农业还停留在“靠天吃饭”的阶段，普通蔬菜卖不上价，农民收入微薄。

直到2005年，第一次接触到洪山菜薹，给我很大的触动。当时普通菜薹只能卖2—3元一斤，但洪山菜薹竟能卖到40元一斤，还时常供不应求。那一刻，我仿佛找到了农业的出路——品牌化。只有打造特色品牌，才能让农产品摆脱“贱卖”的命运，真正为农民增收。

品牌为钥，撬动产业

2011年，我和朋友共同创立了湖北菱湖尚品洪山菜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创业之初，我们便确立了“品牌先行”的战略。

洪山菜薹历史悠久，曾是皇家贡品，但多年来分散种植、缺乏标准，导致品质参差不齐。为此，我们联合华中农业大学专家制定种植标准，恢复洪山菜薹原产地“宝通寺禅耕园”，并注册“塔影钟声”品牌。

通过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包装，

洪山菜薹每公顷的产值提升至15万元，纯收入约11万元，还带动周边2000多户农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洪山菜薹的成功让我更加坚信，品牌化是农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路径。

201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餐桌上听朋友介绍起蔡甸藕汤，了解到蔡甸莲藕的困境。同样作为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蔡甸莲藕却没有洪山菜薹这么“金贵”，因缺乏品牌溢价，藕农收入微薄。当时我就想，现在自己已经有了农业创业的经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尽我所能，

把蔡甸莲藕也做成一个产业，既能撬动一方经济，又能带动更多的村民增收致富。

很快，我们就在蔡甸区成立武汉绿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蔡甸莲藕品牌化运营和产业化运作。刚开始在高新村流转了1210亩土地，从种植到加工，构建莲藕全产业链。为了突破技术瓶颈，我们与多家科研机构合作，攻克莲藕保鲜难题，研发出即食藕粉、卤藕等深加工产品。

2020年，我们还在高新村打造集农业生产、科普教育于一体的农耕研学基地——绿乐·谷叭谷叭农耕科普基地。项目占地1000余亩，旨在以高新村为背景，借助研学旅行引流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兑现资源禀赋。以此为基石，我们成功开辟了一条融入农村、农业的发展新模式。

农旅产业具有显著的关联带动效应，不仅直接增加旅游收入，还推动了蔡甸区民宿、餐饮、农副产品销售、旅游观光及绿色种植等产业的协同发展。

如今，蔡甸莲藕的附加值提升3倍以上，

带动周边6个村集体经济发展，吸纳千余名村民就业。更让我欣慰的是，村里的老人们不再守着几亩薄田叹气，他们种藕、加工、卖特产，甚至当起研学基地的“农耕导师”，年收入翻了几番。

履职为民，推动共富

这些年，公司资产规模突破5亿元，我始终铭记企业的价值不仅在于盈利，更在于回馈社会。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为一线抗疫单位配送蔬菜3万斤；洪水肆虐时，员工自发组成志愿队参与抢险。2023年，公司获评“武汉市抗疫保供突出贡献企业”，这份荣誉属于每一位扎根土地的农人。

2017年当选洪山菜薹产业协会会长后，我努力推动洪山菜薹标准化种植，联合制定行业标准。我们与华农、省市农科院专家多次讨论以及实地考察，联合制定发布《洪山菜薹第1部分：品种》《洪山菜薹第2部分：产地环境质量》《洪山菜薹第3部分：生产技术规程》系列标准。随着标准化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昔日“贡品”走入了寻常百姓家的餐桌。

2020年，我当选蔡甸区政协委员，开始以委员的身份去关注蔡甸区的历史和发展。作为湖北省莲产业核心区，蔡甸区种植莲藕有一千多年历史，是中国莲藕人工栽培的起源地，也是全国最大的区县级莲藕生产基地，被誉为中国“莲藕之乡”。

莲藕作为蔡甸区十大支撑产业之一，一直面临着产业短板：产业规模不够凸显、缺乏强势品牌带动、藕农收益无法保障等。越来越多的蔡甸年轻人只能选择外出务工。



在蔡甸区参加“闹春耕”活动

面对如此严峻形势，在担任区政协委员后，我便开始积极参与收集社情民意，反映民众诉求，搭建沟通桥梁；更深入田间地头调研，撰写提案呼吁延长莲藕产业链。

2020年，《延长莲藕产业链，做大做强蔡甸莲藕品牌的建议》被列为区重点提案，区政府投入专项资金扶持加工和研发。我们还成立“蔡甸莲藕产业链联合党委”，整合企业、农户、科研单位资源，形成发展合力。

政协委员的担子沉甸甸的。提案被列为重点督办后，我曾在藕塘边守候至天明，反复思考如何落实。露水滴答声中，仿佛听见土地在诉说。

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人的马拉松，而是千万双手的共同托举。未来，我将继续带领乡亲们把莲藕种成金链条，让每粒种子都结出共富的果实——这是生我养我的土地赋予我的使命，也是刻在骨子里的初心。

厚德实干，义利天下

◇ 万明才

人物名片：万明才，湖北省江西商会会长，赣商总会常务副会长，武汉常安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有着900多年历史的“江右商帮”，以“人数之众、操业之广、渗透力之强”曾经称雄中华工商业，成为我国古时实力最强的商帮之一。随着历史的推进，江右商被冠以新称谓“赣商”。

当代赣商遍布世界各地，目前全国各地及境外赣商超过300万人，创办超过4万家企业。凭借厚德实干、义利天下的赣商精神，在各行各业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作为在外打拼赣商中的一员，我以赣商精神为准则，在武汉闯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

实干，跳出龙门

1976年，我出生在江西省东乡县詹圩镇。那个时代的农村，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物质资源贫乏。由于家境贫寒，我十来岁就

扛起家庭的重任，日子过得很苦。但我始终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对未来充满期待。

人们总喜欢以诗人的情怀，把乡村吟诵成久违的山水田园。但那里绝不只有《山楂树之恋》里的清静安闲，还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喂猪、放牛、打谷、割草……理想与现实，仅仅差了一段从农村到城市的距离，这段路不远，却很难抵达。故而“跳农门”，曾是几代农村人的励志名词。

1994年，正值改革开放黄金时期，全国掀起了外出打工的热潮。我背着简单的行李包，怀着对前辈的敬慕和未来的希冀离开故乡。

江西素有“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天下当老板”的传统。湖广邻近江西，“趾相错，踵相接”，是江西商人的主要活动区域。武昌、汉口、汉阳“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俱以贸易为业”，故江西商人到武汉犹如跨门过庭。所以我的首选也是武汉。

在武汉，我从搬砖头提灰桶干起。酷暑下的工地是非常难熬的，加上早期建筑安



万明才

全防护有限，随时面临潜在危险，我默默承受着身体负担和心理压力。

建筑行业虽苦，但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在环境恶劣的岗位上扎实干、勤奋学，不断积累相关的知识和经验。这种耕耘后收获的过程，就像是一种修行。

经过多个建筑工地的摸爬滚打，我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渐渐地，我对房产开发行业有了一定的观察和市场思考。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我认为武汉及周边的市场，做房产将大有可为。

秉承着不怕苦不怕累的赣商精神，加上一些朋友的助力，我抢占先机进入房地产开发行业。那些年，先后开发了常安马城壹号、常安万豪公馆、阳逻当代满庭春、抚州当代城、抚州当代阅、武汉万国府、当代全品家产业园等多个项目和楼盘。经过整整10年的积淀，在整个市场前景一片大好的情况下，2004年创建了自己的房产开发团队——武汉常安置业有限公司。

2007年以来，共开发地产项目近200万平方米，并创建以房地产开发投资销售、市政建筑工程、家居建材生产制造、酒店投资运营、新能源新材料生产投资、教育文化投资为一体的多元化实业公司。

义利，信誉是无价之宝

无利不成商，商人是“利”的产物。但君子爱财、取之以道，当义利不可得兼，我们赣商通常会以“义”为重，诚信至上。

我常常告诉员工，资不抵债企业破产，失去信誉人格破产。企业破产可东山再起；人格破产，再难重建。信誉是无价之宝，需悉心守护。

公司在业务往来中严格执行合同规定，从未发生违约欠款的现象，更无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我要求公司认真做好售后服务工作，定期回访客户，及时掌握客户的满意度，对客户不满意的地方及时改进，直至客户满意。在财务管理上，严格执行国家财务管理制度，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建立会计核算，依法纳税。公司在与多家银行的结算往来中，从未出现不良信用记录。

正是重合同守信用的契约精神，为公司摘取了一块块刻有“信用”的金字牌匾。2006年公司被评为消费者满意单位，2007年获评文明优良工地，此后质量·服务·诚信AAA企业、守合同重信用企业、AAA级信用企业等荣誉接踵而至。

办企业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关键在诚。不诚，则不成；大诚，则大成；真诚，则真成；至诚，则至成。对此我深信不疑。

真诚让我交到了很多朋友，结了很多善缘，也获取了很多智慧的建议。在房地产下行的大环境下，我得以及时调整产业发展方向，带领常安走出了以城市更新与投资发展、绿色建筑地产开发、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酒店运营管理、家居建材生产销售为核心的业务布局，成长为一二三级联动的多元化产业集团。



组织员工赴内蒙古旅游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我掌控企业的发展方向与时代发展赛道同向而进，先后进入新能源材料、科技企业孵化、教育产业化、医疗健康等行业投资发展，让企业焕发新的活力。

厚德，以人为本带队伍

江西是儒家文脉兴盛之地。春秋时期，孔子弟子澹台灭明便在南昌传播儒家思想，故江西虽地处南方，却无“南蛮”之说。朱熹理学、阳明心学均在江西大成。江西是道教发源之地，更是禅宗文化兴盛之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地域格局，更是孕育了江西人内敛、淳朴、厚道的品格。

我从一个泥瓦匠干到企业总经理，从做建筑板块到成为这个板块的建材商，之后成为一个建筑工程的承包者，再成为一个施工总承包商，最后成为房地产企业的开发商及多元化集团公司掌舵人，正是我多年对“人”思考探索的结果，摸索出一套自己的“人本管理”方法——以人为本，和谐共赢。

作为一名管理者，首先要知道你的员工需要什么。要了解员工需求，倾听员工想法，还要了解整个团队的现状，包括工作环境、团队氛围、工作效率等。我通过日常观

察、座谈会、问卷调查等方式来掌握员工思想动态，从而确定关心和激励员工的工作思路和方法。

我十分重视对人的精神关怀。人天生渴望得到理解和尊重，在一个受尊重的环境里工作，会让人更乐意去贡献自己实现价值。在员工生日时表达生日祝福、在重大节日给员工发送福利、高温季节给员工发放降温物资、在项目现场提供防暑降温饮品等，并把这些关怀

逐渐制度化。通过建立“归属感”，营造“家”文化。

作为企业大家长，我关心员工，以情暖人，员工有困难时，我全力帮助，给予他们温暖和力量。但在工作中，我从严要求：干者不让他吃亏，混者不让他沾光，邪恶者不让他得意，正义者不让他伤心。

我一直致力于搭建常安人才梯队，优秀的人会产生虹吸效应，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人”的工作做不好，就像给羸弱的身体狂吃人参，不但不受益，还会产生副作用。所以在进入环节设置门槛，每年都会引进文凭高、素质高、专业水平强、敬业心重的高端人才，并建立健全的人才培养体系，定期派出部门人员参加学习、培训，加强专业知识素养。

我也同样严于律己，除了经常参加企业培训机构组织的学习外，还就读了武汉大学总裁及工商管理硕士班。通过严格考试，取得了本科毕业证书。

天下，联谊乡情众商成道

天下，是成就价值赣商的载体。江西五大水系，赣江、抚河、修水、饶河、信

江，终归鄱阳湖集结，然后从湖口入长江进大海。因此，江西的水，不仅哺育江西人，而且哺育“天下人”，赣商便有了“哺育天下”的家国情怀。

首先是商通天下的情怀。湖北省江西商会成立于2009年，致力于繁荣湖北、江西两省经济，通过搭建政商桥梁、凝聚乡情力量、开展商务服务，努力实现在鄂赣商“团结同心、发展共赢”。

作为在湖北发展的江西籍企业家，我对乡友和故乡有着深厚的感情，2010年就加入了商会。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我积极为商会发展献计献策，深受会员的信任和厚爱。在众多在鄂赣籍企业家的拥护下，2024年我有幸当选湖北省江西商会第四届会长。

会长一职我既感荣幸又倍感压力。对于新一届商会的发展，我做出了自己的布局。首要大事是同心协力建设商会大厦。湖北赣商大厦选址于硚口区解放大道古田四路，总建筑面积约39900平方米，涵盖商会成员企业办公，及酒店、餐饮等功能，真正打造一个江西人在武汉的家。

同时优化商会组织架构，利用商会的协调职能，建立多行业经营平台，促进会员企业间的业务合作；加强对会员企业的宣传工作，打造新媒体平台，提升商会对外影响力；全面加强会员服务，扩充各类专业性人才队伍，并开展业务培训；引领商会党支部换届工作，并开展多场党建活动；汇聚在鄂的赣籍医疗工作人员，成立湖北赣医工作委员会，为湖北赣商提供更好的就医通道和医疗服务。



2014年，捐助西隐寺重建

第二是兼济天下的情怀。主动承担造福一方的社会责任，是企业获得良好品牌形象和社会美誉的前提，也是实现企业和社会共同发展的基础。而在赣商身上，舍“小我”成“大我”的情怀尤为明显。

在公司刚有起色时，我就积极参加公益慈善活动，至今先后荣获“人道救助贡献奖”、赣鄱爱心“榜样集体”等荣誉。这些年，先后为汶川地震抗灾救灾、对农民工医疗救助、江西新农村建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捐款捐资累计上千万元。

我始终坚持学雷锋活动常态化、爱心助学活动常态化、帮助弱势群体常态化、公益捐赠常态化。在湖北江西商会里，做公益早已是一件习惯成自然的事。

我们这一代，乘着改革的春风，带着故乡的泥土气息在异地打拼，如今过上了好日子。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日子仍然过得很艰难。我们要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帮助他们致富，让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找到成就感。这就是我，以及我们商会的宗旨。

江北喋血（上）：潜太与黄广战役

——“保卫大武汉”系列之五

◇ 涂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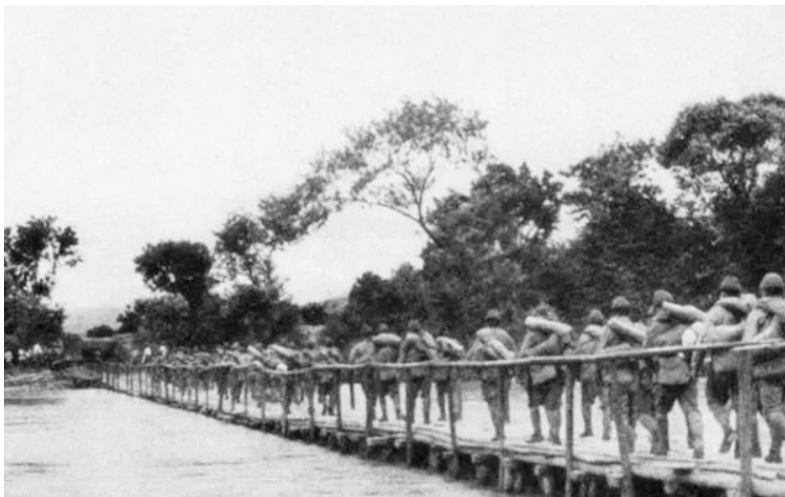
日军于6月12日攻占安庆后，兵分三路，两路沿长江两岸西进，一路沿大别山北麓西进。其中稻叶四郎指挥的第6师团沿长江北岸进攻武汉。

为阻止日军西进，第五战区在长江北岸部署重兵，严加防守，“即以杨森集团占领望江、太湖之线，以徐源泉集团占领潜山以西山地，侧击潜太西进之敌；另以韦云淞部位置于太湖附近，策应徐军之作战。7月上旬至中旬之间，敌以其第六师团一部牵制我军，而将主力转用于长江右岸。我各部除对当面之敌猛攻，牵制其转用外，并以主力占领广济亘太湖、潜山西北连山之线，侧击西进之敌。一部守备田家镇要塞，及黄梅、

宿松附近沿江各要点。扼止敌之登陆”（《武汉会战经过1938年6—11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年，P219）。长江北岸的潜（山）太（湖）战役、黄（梅）广（济）战役和田家镇保卫战于6月14日至9月29日相继展开。

潜（山）太（湖）战役

6月14日，攻占桐城的日军第6师团第11旅团开始向潜山进攻，潜（山）太（湖）战役打响。舒城—桐城—潜山—太湖—黄



日军川真田部队通过潜山附近一座工兵搭建的桥梁

梅至小池口一线，在武汉保卫战中地位重要，为第五战区长江北岸第一道防线，在此布防6个军13个师。15、16两日，国军第134师与敌军在潘家铺、七里冈发生激烈战斗，16日早晨敌军迫近潜山县城，17日潜山被日军攻陷，合肥至安庆公路被日军打通。

关于潜山战役，日本战史曾这样记述：

“6月13日，坂井支队的步兵第四十七联队占领桐城（舒城南50公里）。坂井支队继续向安庆南下，但至14日晨得知波田支队已占领安庆，奉命攻占潜山，于是向潜山前进。潜山地区是保卫武汉主要阵地的大别山脉地段的最右翼据点，驻有四川军的第一四六、第一四七师。坂井支队于17日10时比较容易地占领了潜山城，但在潜山西面的潜水对岸设有坚固的敌军阵地，仍继续抵抗。连日的阴雨至17日虽然渐停，但由于潜水涨水，河宽约达300米，浊水泛滥水深达两米以上。坂井支队于18日黎明强行渡过潜水，死伤多人，进入对岸后开始攻击。潜水附近之敌，从6月19日开始总退却”（《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攻占武汉作战》，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

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年，P290）。

日军占领潜山后，兵分两路，一路直奔太湖而去，一路向王家牌楼追击。6月19日，日军沿太潜公路向太湖进发，李品仙令第10、31军扼守太潜公路西侧山地，令第145师守太湖及附近地区。“我为阻敌西进，乃以李品仙指挥杨森集团占领望江、太湖之线，以徐源泉集团军（26AG）在潜

山以西山地、王家牌楼附近之线侧击沿潜太路西进之敌”（《第五战区关于武汉会战长江北岸之战斗经过概要1938年6月》，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年，P213）。6月下旬，进攻日军因伤亡较大，加上2000多人患疟疾而被迫休整，中国军队乘机反击，第199师攻克渡埠，焚烧了潜太公路大桥，一度还收复潜山县城，但旋复旋失。

6月下旬至7月上旬，日军组建由冈村宁次任司令官的第11军，进攻潜太地区的日军改由第6师团担负，7月19日由潜山向太湖西进。中国守军为第31军，以主力驻扎于太湖以西的大别山东麓，以一部分守潜山到太湖、宿松公路沿线，以第414旅823团守太湖县城。24日，日军第6师团分两路向太湖发起进攻，其中一路第36旅团（牛岛支队）首战即占领823团新仓阵地。25日，第6师团一部进攻第41师121旅的马安堰、广峰寨阵地，以及第123旅的双尖阵地；另一部进攻何家墩公路右侧高地、张何铺、转桥头阵地，并攻占了823团骆龙山、官桥阵地。此外，小池驿、枫香岭、刘家山

铺阵地也被日军攻占。国军撤至太湖、棋盘石。26日，日军从拂晓发动对太湖城的进攻，余家岭、龙王寨、徐家桥、孟家岭、五显庙、杨家岭等处第68军693、785团、守卫太湖县城的823团等虽竭力抵抗，但终因军力不支而致太湖城陷落。

尽管太湖最终失守，太湖保卫战在整个武汉会战中仍是较成功的战例，美国学者麦金龙对之评价颇高：“在长江以北的第五战区，中国军队的抵抗非常有序且富有成效，因此在战役的前期阶段，中国军队的多次有效阻击大大减缓了日军向武汉推进的速度。指挥这些战斗的都是徐州会战中赫赫有名的战将：孙连仲、张自忠、汤恩伯及其他著名人物。在大别山脉南麓的太湖（几乎就在马当的北面），中国军队尽全力把日军困住了3个星期，直到7月25日日军才占领这个据点”（〔美〕麦金龙《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武汉出版社，2008年，P50）。

太湖失守后，负责守卫太湖地区的国军在霸王庙、紫金山之线，第26集团军占领潜太公路上的王家牌楼、仰天岩线侧面阵地，在凉亭河顽强抵抗，从大别山长河河谷反击，牵制日军。日军攻占太湖县城后，兵分两路继续西进，一路攻宿松，一路攻黄梅。国军第31军在宝山、怀雨寨、吴家油坊、七凹岭、龙山宫、罗家岭、长马岭、花凉亭、张家坳、芭蕉堡、夫子岭、黄家岭、四面尖、风虎尖、罗家山、西风疃、鹰嘴岩、陈家岭、十凉亭等地，在27—29日三天内，对日反击作战290多次，兵员损失惨重。8月2日，日军第6师团今井支队（前坂井支队）、牛



日军进攻太湖陷入泥潭

岛支队攻占宿松县城。潜太战役告一段落。而日军另一部则于8月1日攻至界岭、潘铺、枫树岭等鄂皖交界处，黄（梅）广（济）战役拉开帷幕。

黄（梅）广（济）战役

日军攻下宿松县城后，国军组织反击试图克复宿松县城，第68军693团一部渡过二郎河，对占据宿松的日军右侧背出击。第48师144旅攻击王家牌楼的日军并攻占其附近高地，第199师1145团向老岭头、迫高岭、青口驿出击，1146团在余家铺与日军激战，打死日军第103联队长长谷川幸造大佐。

8月2日，攻陷宿松县城的日军迅速西进，协同由小池口北进的两个联队逼近黄梅县城，与国军第119师在潘家埔、长岭铺、鲍家山、下河桥、两河口、马尾巴等地发生激战，8月3日晚攻入黄梅县城，守军与之展开巷战，不敌而撤出。

日军占领黄梅后，西进步伐暂缓，一方面，“在地形上，右受我山地部队瞰制，



日军若松部队进入广济县城

左为长江及湖沼所限，西进困难。斯时，我江北部队以 68A、8A 担任（井边、大金铺、团山河、破山口、大河铺、苦竹口、渡河桥）黄梅西北之阵地线为守势地区，以 31A、7A、10A 及川军一部控制于隘口坝、天庙、马王庙、太湖河及太湖、搭山西北之高地，黄梅东北及太湖、潜山西北之高地为攻势地区，由侧面攻击深入潜、太、宿之敌”（《第五战区关于武汉会战长江北岸之战斗经过概要 1938 年 6 月》，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 年，P213）；一方面，日军认为攻下黄梅县城后，其拓展长江北岸前进阵地之战略步骤基本达到，在两岸主阵地决战前，拟采取南攻北守战略，主要兵力用于攻打九江及其周围地带，以造成两岸犄角之势（参见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 年，P92—93）。

但是，日本企图以逸待劳，蓄力再战只能是一厢情愿。8 月 3 日黄梅失陷后，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白崇禧亲临第 4 兵团指挥部，布署在潜、太、宿、黄全线反攻事宜。4 日，第 135 师向占据花凉亭的日军第 6 师团发起进攻，在凉亭河东北的燕窝地附近的叫雨尖等地与其交战；第 41 师在白庙、风虎尖、小池驿打击日军；第 48 师 283 团一部在潜太公路袭击日军汽车队；287 团一部进攻王家牌楼的日军；第 199 师 573 旅在马石堰攻击日军；第 28 军团主力在黄泥湖北岸、乌龟山巨大金铺、吴文贵、团山河、笔架山、恶云集、塔儿湾、破竹口、排子山、亭前驿、二郎河至墨烟铺线占领阵地。

由此一直到 8 月下旬，第 119 师、135 师、131 师、41 师、48 师、171、172 师、173 师、189 师等，在黄、宿、太、潜一线展开持续攻击，打乱日军“休整”计划。24 日，第五战区第 4 兵团发起对潜、太、宿、黄的进攻，“8 月 26 日，我 7A（张）10A（徐）反攻太湖、潜山，当将两地规复，敌变换联络线于小池口方面。28、29 两日正面我 68A（刘）84A（覃）复开始向黄梅之敌（6D 及 3D 之 5B）攻击，激战甚烈。敌据险顽抗，攻击迄少进展，唯予敌以重创，死伤累累，惜我之伤亡亦重”（《第五战区关于武汉会战长江北岸之战斗经过概要 1938 年 6 月》，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 年，P213）。

24—29 日的总攻战果不错，一度收复潜山、太湖（26 日）和宿松（28 日），并给占据黄梅之敌以重创，“26 日，我张淦、徐源泉两军，反攻太湖、潜山，当将敌击败，收复两地，敌向东南溃退。28、29 两日，我刘汝明、覃联芳两军，复开始向黄梅之敌

猛烈攻击，歼敌甚众”（《武汉会战经过 1938 年 6—11 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 年，P220）。

中国军队的有力反击，不仅使日军的休整计划被打乱，而且让其感受到了西进速度严重受阻。“在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下，9 月份，日军发现他们沿长江推进 10 英里需要 3 个星期。日军行进速度如此之慢，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 8 月底薛岳率领 10 万军队在长江北面 10 英里处的黄梅进行了有效的阻击，迫使这股日军折回大别山区。最终，日军指挥官今村不得不从其他地方紧急调动援军”（〔美〕麦金龙《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武汉出版社，2008，P50—51）。

8 月 30 日，认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日军调整部署并调集军队，除第 6 师团主力外，新增 2 个装甲车中队，放弃潜山、太湖和宿松，重点加强在黄（梅）广（济）地区的攻势，其牛岛支队和今村支队以及师团预备队第 13 联队开始向广济西进，其他部队则在黄梅正面进攻魏家凉亭、李家湾、莲花塘、青石桥等处，攻占苦竹口、油铺街。国军第 176 师、189 师阵地被摧毁伤亡巨大，189 师伤亡约二分之一，176 师伤亡约三分之一。

9 月 1 日，国军 150 师收复苦竹口、排子山，日军第 6 师团在海军第 1 联合航空队 12 架战机的配合下，攻至广济附近，牛岛支队进至双城驿南北之线，今村支队进至双城驿以南千家楼西侧地区。

2 日，日军继续向广济进攻，攻克笔架山、凤凰山、恶人寨、香炉山、孔家湾、大坡、排子山、英山嘴等阵地，战斗中施放毒气。国军第 29 师、176 师、188 师、119 师奋力

抵抗，第 68 军反攻夺回大佛寨阵地。国军因伤亡严重，于晚间退守团山河、田家寨、生金寨、后湖寨、大洋庙之线。

3 日，日军第 6 师团攻击五峰山、车坊铺、徐家河，牛岛支队攻占金山寺，今村支队攻占大符山、田家寨南端等阵地。国军第 68 军固守团山河、观音寨、蓝家湾、大佛寨等阵地；第 86 军固守笔架山、田家寨阵地；第 31 军 135 师扼守鼓儿寨、后湖山一线，第 176 师策应 135 师作战；第 84 军撤守沿后湖寨以东经鹅公岭至大洋庙、上包一线，以 131 师为总预备队。双方在破城山、塔儿寨、双城驿、排子山等地展开拉锯战，一些阵地多次失而复得和得而复失，国军付出惨重代价，第 84 军伤亡二分之一，第 176 师伤亡二分之一，第 119 师及 31 旅每团仅剩 200—300 人，不得已只得撤至双城驿、蛇腰山一线。

4 日，日军第 6 师团进攻五峰山、车坊铺、徐家河；牛岛支队攻占金山寺；今村支队攻占大符山、田家寨。第 189 师在放马厂、石佛庵、双城驿，第 188 师在生金寨与后湖寨之线，第 28 军团在狮子山、团山河、大佛寨等阵地与日军激战。189 师的一个团，在与敌军血战昼夜，毙伤敌数百后，团长与全团官兵壮烈殉国。

5 日，日军在海陆军战机配合下，攻占田家寨、笔架山、千土村、石门山、鹅山寨等阵地，进至茅栗砦南北之线。配合作战的日机轰炸二龙门阵地、松阳西面村庄、茅林岩、龙山砦阵地、萧家铺北面、大符山南面阵地、石间山东北、大符山西南阵地等。国军第 29 集团军、第 48 军攻击双城驿、大河铺的第 6 师团，占领凤凰山、团山河、破山口一带。

日军第 6 师团全力进攻广济，致使其



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学员

后方空虚，国军最高统帅部遂部署在敌后潜山、舒城、黄梅袭击敌人，以收“围魏救赵”并断其补给之效。以第29集团军拊敌侧背，以纾广济之危；第26集团军以一部围攻潜山，克服潜山后以主力迅速攻占舒城。从9月3日开始，第48军主力由宿松向黄梅攻击，川军第44军、67军进攻黄梅、广济之间要冲大金铺和黄梅县城。日军迫不得已抽调部分兵力在黄梅维护其补给线。

然国军攻侧背、抄后路战术并没有阻挡日军进攻广济的步伐。6日，日本海军第15航空队倾巢出动，对守卫广济及周围地区狂轰滥炸，尽管国军从南北两个方向顽强抵抗，但牛岛支队攻占南山寨与石铺岭之线，今村支队攻进孝子牌南面高地，广济失陷。

广济失陷后，国军最高统帅部要求第五战区总结教训，组织反击。白崇禧遂指示第4兵团“改取机动配置，正面仍以一部守御，主力集结敌之侧背，求其弱点，相机攻击，断其后方联络线，以此广大地域，运用广大面之运动战”。第4兵团按白崇禧指示发布

“广济附近第二期会战计划”：“本兵团为求与敌旷日持久，以一部固守广济西方张八寺、陶斯埡、桥叶岭、麒麟山间地区，以主力由北向南沿广黄公路向西或向南突进之敌，攻其侧背，另以有力部队掩护田家镇要塞侧背，并相机由南向北攻敌侧背，企收夹击之效，务聚歼敌人于广济附近山地内，至少亦应限制敌之行动，使其不能发展为要。”具体部署为：第86、55军在广济以西设防，拒止向西突进之敌；第26军布置于广济与田家镇之间，攻击由广济沿公路西进日军之侧背，并尽力拒止直接攻击田家镇侧背之日军；第31军（附176师）以一部推进广济以北地区，沿公路北搜索敌情，其余部队对向西或向南突进之敌断行攻势；第84军以一部对公路沿线地区搜索敌情，其余主力保持机动，攻击向西突进日军之侧背，遮断其后方联络。

中国军队从7日开始广济反击战。第31军夺回一度失守的界岭阵地，尔后坚守阵地一直抵抗日军；第55军在五里铺、十里铺、松阳桥、凤凰山、龙顶寨、困龙山、官仁桥、郝皮地等地与第6师团交战。特别是8日在凤凰山与敌军的激战，伤亡巨大。8日，第26军第44师在松阳桥东南、南面高地与今村支队交战；第26军在松阳桥与日军彻夜激战；12日，第26军44师、第7军三个师在广济西面包围、进攻第6师团。

此后10月6日。第26军军长萧之楚向最高指挥部报告过这次作战经过：9月4日奉令，以三十二师攻击狮子山、凤凰山、破山口之敌；四四师固守大金铺至吴文贵之线。5日7时，三二师攻克狮子山、凤凰山，正争夺破山口时，敌大队飞机轮炸，我方伤亡重大。迄晚奉副长官电话：“速派兵一旅，向石门山协助八十六军攻击，三二师即退至

吴文贵附近。”6日7时，四四师之王旅，将石门山克复，并围攻干士。7时奉令：“本军于本日20时，开始转近，以确保田家镇、蕲春地区之目的，集结于陶家墩、四望山、马家湾、铁石坡附近。”7日拂晓，各部逐渐到达指定地点。晚奉令：“着本军派有力之一师，侧击松杨桥之敌，其余仍占领陶家岭至栗木桥间之阵地。”遵派四十四师出击，三十二师留守原阵地。8日5时，四四师攻占松杨桥以南高地，将敌压迫于松杨桥东北地区，广浰公路，已受我极大瞰制。旋又奉命：“着即断然向广浰公路西进之敌猛击，策应曹、何军之作战。”遂即派三二师一团协攻。适又奉命：“着以全力解决松杨桥当面之敌。”遵即亲率全部，于9日23时，分三路向广界公路中间之敌猛攻，经彻夜血战，10日拂晓，将松杨桥附近各要地，确实完全克服，残敌向松杨桥东北小地溃退。正聚歼中，适由界岭回援之敌，及广济增来之敌赶至，多次反攻，均经击退。敌为后路已断，行见就歼，乃放大量窒息性毒气，致守兵三营，死亡殆尽。14日奉命：“以三二师之一团，协助五五军攻击龙项寨”。17日6时，我三二师，正式克服该寨（《萧之楚报告广济附近之作战及应援田家镇要塞之战斗经过1938年10月6日》，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年，P218）。

9月11日，国军从北、东、南三面向第6师团发起反击，日军感到压力，延缓了第6师团进攻田家镇要塞的步伐，但日军进行了有效还击并施放毒气，致使国军伤亡惨重，第55军康玉山团伤亡殆尽，第86旅旅长陈德馨、团长周继光身负重伤，所部官兵皆壮烈牺牲，反击效果大打折扣。

关于广济之战，中国方面《武汉会战

经过1938年6—10月》如是概述：

迄8月下旬，沿潜黄道西进之敌，其先头与我对峙于黄梅以西之金钟铺南北之线，以待后续部队之集中，再图西犯。26日，我张淦、徐源泉两军，反攻太湖、潜山，当将敌击败，收复两地，敌向东南溃退。28、29两日，我刘汝明、覃联芳两军，复开始向黄梅之敌猛烈进攻，歼敌甚众。30日至9月1日之间，敌分路向我反攻，我因伤亡甚大，2日晚退守团山河、田家寨、生金寨、后湖寨、大洋庙之线。3日以后，敌向我团山河一带阵地攻击，战况空前激烈，迄6日晚，我因伤亡重大，乃向广济西北高地转进，并以第二六军，协助田家镇第二军之作战；同时，第五五军阵地亦被敌冲破，敌狼奔豕突，凶焰如燎，我第二六、第八四等军乘敌不备，予以迎头痛击，敌死伤盈野。旋敌增援反攻，并大量施放毒气。我为避免无谓死伤，乃将广济放弃。8日，我韦云淞军复由黄婆口向广济城反攻，敌不支，向东南溃退，我军克复广济城，获敌辎重甚多。9日晨，敌增援反攻，该城复被攻陷。（《武汉会战经过1938年6—11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转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出版社，2007年，P220）。

涂文学，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绍竑任职湖北省政府主席前后

◇ 席丹

黄绍竑（1895—1966），政治活动家和军事家，新桂系三巨头（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之一，以政治、军事谋略见长。解放前，黄绍竑历任第7军党代表、广西省主席、15军军长、行政院内政部长、浙江省主席（两度）、湖北省主席、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长、监察院副院长等要职。他出生于书香家庭，却是行伍底色，十几岁便参加军校；虽然几经战场，后来又回归行政，是军人出身的能吏，出任过三个省的政府主席；他是新桂系三巨头中最为倾向中共的，在北平和谈中极力斡旋，推动国共双方实现停战合作，但也是一系列反动事件的参与者甚至是组织者。新中国成立前后，白崇禧战败退往

台湾、李宗仁下野客居美国，黄绍竑则通电全国高举起义大旗、北上参加新中国建设。他虽然来自偏远的广西容县，但视野开阔，兴趣爱好高雅，游泳、网球样样通，科技发明有硕果，还是国民党军界“填词第一人”。他长期在浙江这类发达地区执政，政绩显著、深孚众望。

1910年，黄绍竑立志走从军之路，考入广西陆军小学学习，而革命生涯则起步于湖北。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16岁的他作为广西学生军北伐敢死队的骨干，与第一批128员小将一起，从桂林出发支援武昌起义。行程3000余里，历时近两个月，一路杀到武昌。任务完成后，他进入武昌陆

军预备学校，两年后毕业，到北平的陆军第10师入伍。业内人士都认为他毕业于保定军校，实际上他是在入伍后再去保定军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也是保定三期的重要代表，同期校友有白崇禧、吴国桢、张治中、吴石、夏威、朱传经、刘建绪等人。

履新之路一波三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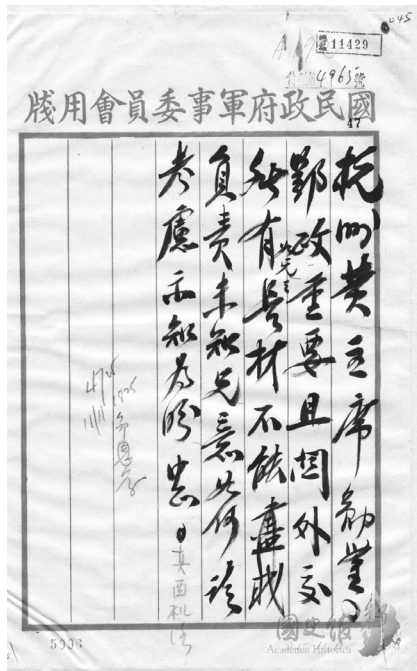
武昌是黄绍竑真正思想启蒙的地方，直接从事革命的起点。当他第一次踏上湖北土地的时候，不知是否想到25年后会主政这个地方。1936年12月1日，国民政府决定黄绍竑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从而开始了他与湖北的再次结缘。

黄绍竑就职湖北起源一个偶发因素。1936年10月25日下午，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在汉口轮渡码头候船回武昌，突遭不明人士连开数枪倒地身亡。杨永泰，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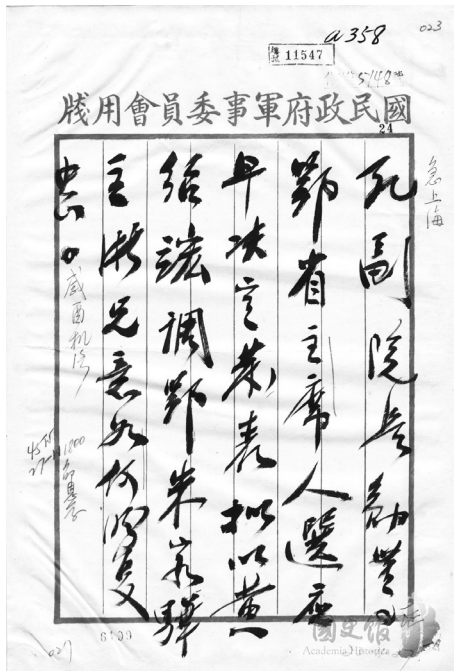
介石的亲信智囊，政学系的大佬，从政后期一直跟随蒋介石左右。1935年12月18日，杨永泰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不想任职不到一年却死于非命。此事震动全国，成为国民党历史上继廖仲恺遇刺后第二起重大谋杀案。紧接着，围绕权力真空各方激烈博弈。湖北地方势力蠢蠢欲动，以何成濬（陆军二级上将）为代表，借鄂人治鄂之名，暗中推动湖北旧军阀徐源泉接任，期望打造何氏“湖北王”的现实利益与历史定位。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在平衡各方的力量后，坚决反对地方势力的崛起甚至割据。面对较复杂的湖北政治环境，必须找一个有影响、有能力的干才接替湖北省政府主席。在此情况下，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成为人选。1936年11月11日，蒋介石电黄绍竑征求意见。11月27日，蒋介石电催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抓紧办理。12月2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消息。至此，黄绍竑开始走向第三个省政府主席岗位。

1926年6月下旬，

李宗仁、白崇禧率军由桂林向湖南出兵北伐，留下“三巨头”之一的黄绍竑在老巢主政，致力于广西的建设及后援工作。此前，黄绍竑在1925年9月5日任广西民政长（相当省主席）、1926年6月1日任省务会议主席（也相当于省主席）、1927年2月25日—1929年5月4日任省政府委员会主席，前后三年半主政广西政务，政声盛隆，为广西成为民国



蒋介石电示黄绍竑考虑就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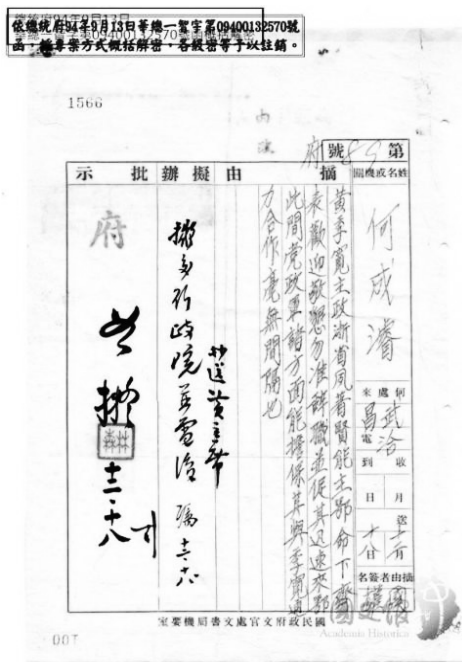
蒋介石电嘱孔祥熙拟调黄绍竑主鄂、朱家骅主浙

时期两个“模范省”之一打下了基础。而得令接替湖北省主席前，已在浙江省主席岗位上近两年。在广西、浙江两地任职之间，他还在中央政府担任内政部长、代理交通部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参谋长，参与指挥长城战役等。以这样的履历和业绩应对湖北复杂的环境，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没想到偶发因

素再次出现。12月上旬黄绍竑做好赴任安排，并与接任的朱家骅约定16日交接。按照惯例，就任之前他要晋谒蒋介石听取工作要求，而蒋介石正在西安。黄绍竑定下12日的航班飞往西安，没想到11日在上海参加欢送赴鄂的晚宴上饮酒过量，醉酒误了第二天去西安的飞机。13日晚传来西安事变的重磅讯息，他的描述是“震撼全国、轰动世界”。国内国际的势力各显神通，谋求自身利益。国民党内部就解决西安问题也分成两派，主张武力讨伐或和平营救。当晚，手握军权的何应钦电召黄绍竑立即赶往南京，共商大计。

黄绍竑被紧急派往山西，与阎锡山一起就近推动营救工作。路途中又遇飞机在开封发生故障，修理后改飞郑州再转车去太原。25日蒋介石平安返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黄绍竑28日返回南京，29日早晨赴南京军校晋谒蒋介石，慰问并请教治理鄂政事宜。



何成濬电林森



何应钦电阎锡山

同时，湖北的地方势力也没有闲着。在明知黄绍竑参与协调营救蒋介石的关键时候，何成濬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称“黄绍竑主政浙省夙著贤能，主鄂命下齐表欢迎，敬恳勿辞并促其迅速来鄂”，实在是用心险恶，逼迫的意味很浓。另据魏元晋介绍：“黄绍竑尚未来鄂，西安事变发生，蒋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扣留。何成濬认为蒋不能生还，组织了湖北请愿团赴南京拒绝黄绍竑来湖北就主席职。同时何成濬又与何应钦、何键（湖南省主席）等谋划扩张势力，保徐源泉为湖北省主席。12月25日晨（作者查核应是24日），汉口市长吴国桢约我一同到机场送何成濬和徐源泉去南京。何、徐飞抵南京时，正值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到南京，何成濬不得不硬起头皮往见蒋介石，碰了蒋的钉子，铩羽而归。”据报载，何、徐两人在南京遍访中枢要员，如何应钦、孔祥熙，极力拉拢湖北在京的大员，有关黄绍竑恳辞湖北省主席的谣言也在京城出现。没

想到蒋介石的平安返京，粉碎了何、徐的梦想。26日，何成濬垂头丧气地晋谒蒋先生，悻悻返回武汉。

再看看湖北当地媒体的报道，1936年12月11日至1937年1月15日，《武汉日报》相关的新闻标题有：黄绍竑月中来鄂履新、黄绍竑来鄂有期即往谒蒋请训定明年元旦就职各厅处长或略有更调下周发表、黄绍竑留沪候晤朱后即来汉、黄绍竑月中来鄂、黄绍竑定期来鄂、黄绍竑日内来鄂履新、黄绍竑即来鄂、黄绍竑昨拜翁文灏、黄绍竑来鄂尚无定期、黄绍竑到郑宋昨由洛西飞、黄绍竑晤阎商陕变问题、黄绍竑徐永昌过徐赴京、黄绍竑昨晨亦谒蒋、黄绍竑到沪今后行止未定、黄绍竑动起来鄂履新、黄绍竑转浙谒蒋请示鄂政方针如无特殊事故明可飞鄂履新、黄绍竑定16日视事、伍廷扬周天放定期来鄂履新十五日随黄绍竑同来、黄绍竑来鄂或又将展期、黄绍竑今飞鄂履新。

仅就一家报纸的标题可以看出，黄绍竑每一次行程改变的背后，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复杂因素，反映了各方势力的角逐，折射出赴汉履新的曲折。

施政理念一以贯之

1937年1月16日，黄绍竑就任湖北省主席。面对300多位现场嘉宾，他发表了施政纲领，其核心五项：忠心本职、发展国防教育使人民具有充分国家观念、努力维持治安整顿保甲根除匪患、浚治江河以平水患、整理土地充裕财源。

黄绍竑对湖北的经济建设、抗战救国、水患治理、城市发展、公务员队伍、民生保障、文化体育等都做出了系列思考和安排。1937年1月18日对全省县政训练所第一期

毕业学员的训话，是黄绍竑第一次公开演讲。他提出对公务员要“以成绩之良否，为去留之标准”；选用人才的标准是“富于朝气、不失时代性而能快干、实干、苦干”。他希望县政人员增进“个人的修养”：一是培养正气，二是修养人格，三是进修学业；他提示“做事的原则”：一是做事的动机，要以国家民族的福利为前提；二是我们有了为国家、民族谋福利的动机，如果没有一个中心人物去领导，由各个人去乱动，也是不行的；三是要顾虑社会的舆论与法律的制裁。他的结论是，“把一切不良的习惯彻底铲除，大家立志做一个新人，努力做一番新事业建设国家”。

湖北经济建设自然是黄绍竑关注的重点，他积极组建湖北经济建设分会，要求工作方针“注意经济的心理建设和物质建设”。他认为，“就是单就本省来说。一是湖南四川的农民，无论山隅水汭，只要可以种植无不尽量利用。反观湖北，荒山荒地随处皆可发现。江苏浙江两省人民对于副业亦极发达，反观本省农村手工业不见发达。二是社会上不良之嗜好，如鸦片、香烟之类，不但消费金钱且损害身体，皆为经济困难之重要原因。”

黄绍竑对湖北的物质条件大为肯定，“本省所具备之经济条件至为优越，既居水陆要冲，交通甚便，天然为工商业之中心；其在农业方面，则原料生产，甚为丰富，可推动工商业之繁荣。物质建设，应以改进棉业为主，希望将纺织品产销地中心的上海，移到我们武汉内地来。”

黄绍竑也注意到了社会和谐与民生稳定，“物质建设应注意各阶级利益之调和，例如去年本省棉花丰收，售价亦高，现在价格日望上涨，照理应该是产棉的农民受到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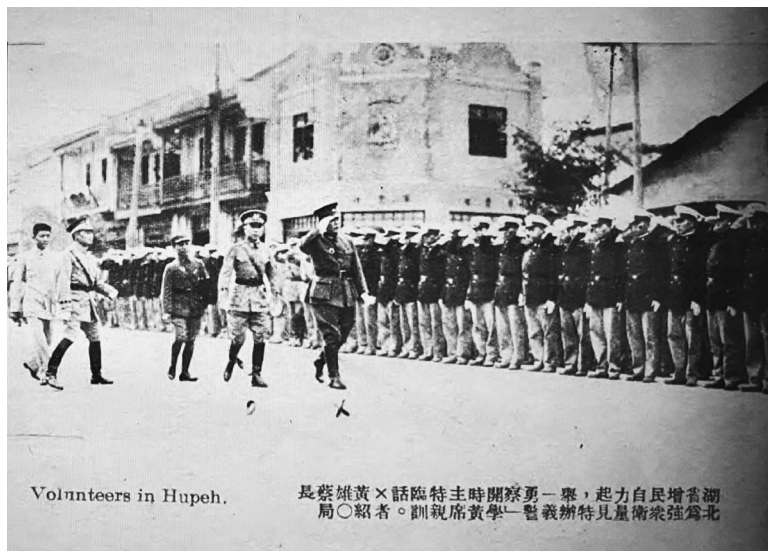
处，但是实际上恐怕得到好处的还是一般经营棉业的商人，棉农还是受他们的剥削，这是国民经济建设推进中一种最可怕的现象。我们希望社会上一般在产业界服务的人，能够放大眼光，注意到大众利益，以求社会之永远安宁和发展。”

绿化与植树是黄绍竑持续关注的重要建设事项，他在参加植树典礼时发表了“吾人对于造林应有之认识”的演词，对植树造林有着近乎执着的重视，“植树是国家兴替，生计荣枯所关。世界上文明国家，便必有秀丽广大的森林，点缀其风景，增胜其国容。盖森林不仅是国家的一大富源，亦且代表其国家的兴盛悠久的历史，和代表其国民醇厚长远的思想。”他反对急功近利，“一般国民对于培植森林，能具有‘十年树木’的耐心，则其对于国家的爱护，自必更有其最大的耐心，即所谓‘故国乔木’之感。中国须要全体国民长久不断的努力和奋斗，我们要以‘十年树木’的决心，来作‘百年树人’的大计。”

关于湖北的绿化建设，黄绍竑说，“我国虽号称地大物博，单就木材一项而说，已是不够用了。试以湖北而论，现有林木为数有限，如现在不广为培植，则五十年后必不够用了。”还要求科学造林、管理护林，“我们今后对于造林运动应该特求改进，造的方法，固然要力求改良；就是管理方法，更要求其适当。如森林火灾之预防和消防，森林盗伐和其他有害行为的预防和制止，有害动物或病因的预防和驱除，林界标志的保存和幼苗的保育，都是管理方面应加注意的事。因为造林，实是一种科学运动。”他希望把植树造林的责任落实在基层，“我记得我的本乡，曾以感于森林焚伐之无法制止，乃改用办法，各乡共立乡约，互相监督，施行起

来，效果大见，今已蔚然成林了。现在乡村中的保甲长，要将护森林的责任负担起来。各乡政受训人员，就是将来领导乡村建设的主要分子。”

黄绍竑持续关注身体健康问题，把健康问题作为国运的关键来认识。他说，“国家所以多耻辱，由于国民不能保护国家，不能抵抗外侮，以致主权领土，屡受侵害，国耻日多一日；国民所以如此，由于身体不健全，不能避免天然的侵害，不能抗拒各种的疾病，致易罹疾病，或濒于死亡，实是人类的奇耻大辱，可简称之为人耻。”“国耻实由人耻所造成，良以国家无健全的国民，国民无健全的身体，则国家未有不衰亡，未有能幸免于敌国的侵略者。我国国耻日甚，领土主权，时受危害，原因虽多，但国民身体孱弱，致难捍卫国家，维护领土主权的完整，实其要因之一；故今后图雪国耻，须先雪人耻，务使吾人之身体，足以与天然的风霜雨露相抗，培成健全的国民，始能进而抗拒敌国外患。”他以湖北学生的身体状况为例，“根据湖北省会学校卫生检查统计，各校学生身体不健全的凡百分之九十五，即每百人中身体健全的仅及五人。省会各校卫生检查结果如此，其他各县市学生民众之病患，当尤加甚。在此种民众多病患身体不健全情况之下，如何谈得到恢复主权，洗涤国耻，实际上距离光明的前途甚远，是以欲雪国耻，增国力，今后非注意于每个国民身体之康健不可。”他坚决反对以竞技作为学校体育的目标，“不过学校对于运动要普遍的提倡，如仅恃制造幼数选手为争夺锦标之运动，则运动之真意义已失，实不足取。各学校应注意使个个学生都是运动员，充分使之发挥其本能始能有良好的成绩表现。各校运动，应注意运动的普遍性。”他在训话中呼吁，



武汉防空演习宣传大会，黄绍竑演说 / 湖北省义勇警察开学，黄绍竑训话

“‘今日图雪国耻，应先雪人耻；不得锦标非耻，身体不健全，无以救国家社会，实为大耻。’‘雪国耻，应先雪人耻’，望牢记不忘！”

除了上面的演讲、报告之外，黄绍竑在湖北任期公开的重要文献还有：内忧外患中我人应有之认识及今后改进县政之要点、今后鄂省施政精神及行政计划之主要骨干、对今后防空希望（武汉防空演习总讲评讲话）、自强救国（对儿童代表团训话）、对于湖北教育界的几个期望（对湖北中学师范教育研究会会员训词）、集训的意义与国防（在乡政人员训练所和学生集训总队部联合训词）、吾人对于国耻历史应有之认识（对乡训所及学生集训总队训词）、对乡训所毕业学员之希望（在乡训所毕业典礼训词）、在航空建设分会及防空协会宣誓就职典礼答词、义勇警察创立意义及任务（在省会警察局义勇警察训练班开学典礼训词）、湖北各县捐税负担情形及地方事业之关系、对武昌市政建设的几点期望（在市政处杨处长就职典礼训词）、在六三纪念宣传周开幕训辞（作者注：民国时期的禁烟节，纪念 1839

年虎门销烟开始日）、精诚团结（对小学教员暑期讲习会员讲演）、战时警察应有之认识（对武汉水陆警察及保甲长义勇警察训话）、战时后方应尽的任务、本省教育施政方针、促进体育与民族复兴、对于湖北教育界的几个期望——对湖北中学师范教育研究会会员训话、吾人对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应有之认识与责任等。他的这些主要观点，可以深切感受到国难当头时黄绍竑的担当和旧时代政治人物的现代意识。即使在近九十年之后的当今，仍然具有参考价值。

回顾黄绍竑在广西、浙江两省担任主席以及他在国民政府担任军政要职时的思想方法和行政理念，确实具有一以贯之的特征。他在广西、浙江施政的思想，学界有一些研究和总结，而在湖北由于时间短、施政效果尚未明显显现，研究发掘也不够。

忠于职守一如既往

黄绍竑在回忆录里写到，“我一月十六日（指 1937 年，下同）到湖北接任视事，八月一日，调回南京，另有任务，中间又在

庐山担任训练工作一个月。实际上完全致力省政的时间，不过五个月。”

史料记载，黄绍竑湖北任职的最长时间记录，可以是1936年12月2日至1937年11月20日，但实际上是1937年1月16日就职，1937年10月8日改由何成濬代理。

黄绍竑年谱记载：1月16日，黄绍竑就湖北省政府主席职。20日，兼任湖北省保安司令。6月20日，黄绍竑到庐山任暑期训练团第二总队队长。7月16日，黄绍竑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庐山谈话会。会后，黄绍竑返武汉筹建信阳、田家镇、黄石岗国防工事。8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于军委会内设六部，以黄绍竑为第一部部长，主管作战计划与作战命令。15日，国防最高会议改第一部为作战部。9月2日，国民政府授予黄绍竑中将军衔加上将衔。13日，侵华日军陷山西大同。黄绍竑衔蒋介石之命到山西视察战况。20日前后，黄绍竑抵太原，因阎锡山已赴雁门关前线，便与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赴雁门关。22日，黄绍竑、阎锡山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商议八路军在山西开展游击战争事宜。10月1日前后，黄绍竑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名义再赴山西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10日，黄绍竑赴娘子关前线指挥。26日，娘子关陷敌。31日，黄绍竑在山西寿县半月村又晤中共和第十八集团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任弼时。11月4日，黄绍竑于深夜退出太原。不久在临汾又晤周恩来，研究华北游击战争问题。26日，国民政府明令黄绍竑为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在武汉交代工作时，又晤周恩来请教发动、组织、团结民众问题。

在黄绍竑的回忆录中，重点工作和形势包括：武汉的环境、武汉的工商业、省署合署办公制的研究、汉冶萍的近况、石

灰窑附近的矿产、应城的石膏盐、湖北的水患和金口的水利工程、湖北的财政、交通及特产、举行县长考试、鄂粤铁路电讯交通的完成、湖北的烟毒、武汉的国际应酬等。

现在很难系统总结研究黄绍竑的湖北履职政绩，可从其时当地媒体的相关报道中了解一些情况。下面节选《武汉日报》新闻标题的部分内容：

黄绍竑考查县政——抽调附近各县长面询或令分别呈报；黄绍竑勗勉乡政人员，昨出席该所纪念周训话；黄绍竑昨在纪念周报告改进县政方针——1. 整理赋税 2. 健全保甲 3. 训练社丁，对内忧外患应奉行中央政策；蒲圻等县土地陈报省府限六月完成，黄绍竑昨召各指导员考询；鄂省府委员会决扩充警务设备费，并通过武昌市政工程概要；黄绍竑昨视察武昌县政府；党政联合纪念周黄绍竑报告鄂政——今后施政精神及行政计画之主要骨干；松滋太平调弦藕池四口，湘强行堵塞，荆州各法团电请省府制止，黄绍竑令徐承熙详查呈核；黄绍竑谈鄂省近况——财政取支尚可平衡，治水机关应予以统一；武汉防空宣传周开幕，二十万民众冒雨参加，黄绍竑希望从此继续努力；吾人对于造林应有之认识，黄绍竑在植树典礼中讲演；武汉防空演习布置就绪，决今日昼夜举行预演，何成濬黄绍竑郭忏等亲临指挥；鄂省会童子军昨举行童军节庆祝会，黄绍竑训词望做到智仁勇三字；黄绍竑昨晚召见各专员，垂询行政区情形；省府筹一百万办理合作金库；省会四期公民训练即将举行总检阅；鄂省府委员会决定发行建设公债五百万，组织航空建设协会湖北分会；黄绍竑决今晨赴遥堤视察；黄绍竑赴遥堤视察，昨晚抵钟祥俟天晴实地察看，归途拟到天门应城等县巡视；黄绍竑视察遥堤详记——每

至一处必下车谛视，沿途对保安队等训话；黄绍竑视察经征所，并询警士户籍卫生情形，召集禁烟会委员谈话；黄绍竑视察水上警察局——当指示推进警政各要点，对农场土地纠纷将提会讨论；黄绍竑前日赴鄂南视察——首至武昌青山实验区，即转往鄂城大冶两县；中国航空建设协会鄂分会开始办公，黄绍竑兼任分会长，聘定各界名流廿一人为委员；鄂省经济建设运动分三个步骤推进——调查、研究、实施；汉市民体育大表演定六月六日举行，聘何成濬黄绍竑等为会长；黄绍竑训勉乡训所毕业学员——按照训练上，三大要点去做；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鄂省分会昨开成立会，黄绍竑讲鄂经济建设之途径，盼今后共同检讨各种问题并见诸实行；黄绍竑由沪飞汉，据谈与中棉公司商洽发展鄂棉等。

下面节选《新民报（汉口）》新闻标题的部分内容：黄绍竑视察武昌县政——武昌建仓积谷大部完成；劝募省市建债，黄绍竑已召集两界宣布意旨；检定县长考试今日开始，黄绍竑核定试题；黄绍竑等正遴聘专员人选，省经建分会决定下周成立；黄绍竑巡视省会工役，并视察棚户生活；黄绍竑视察唐家巷平民新村，苗圃新村五百余栋将竣工，市府派员调查应迁入棚户；黄绍竑注意航业，传见内河航轮局长洪雁宾，洪面陈改进方针颇蒙嘉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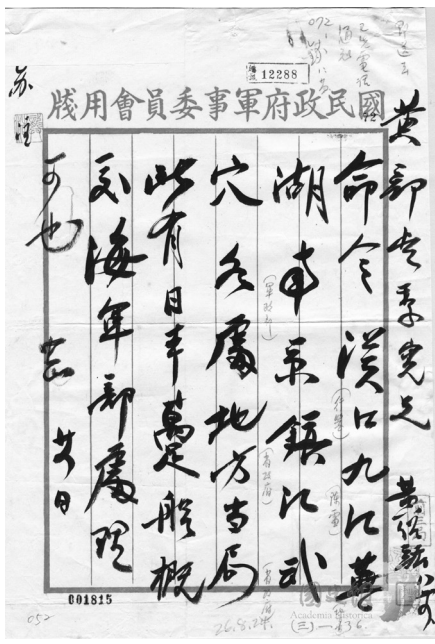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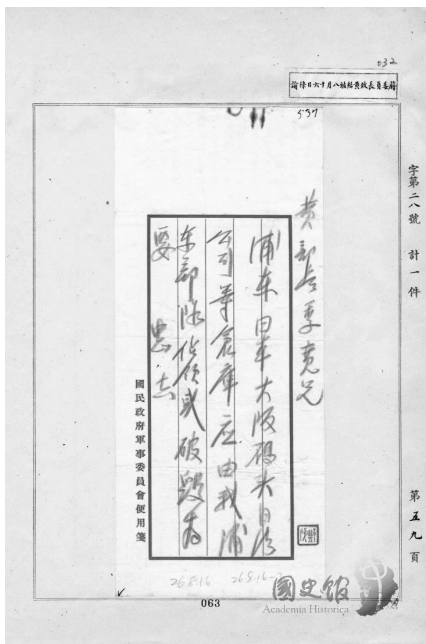
黄绍竑的湖北施政全面而务实，既注重经济建设又考虑治理水患、突出抗战的首要地位兼顾湖北的长远发展、对行政人员的素质要求和行政体系的制度改进并举、关注民生问题体恤民情、推进工作既有战略思考也有具体部署等。化贯军先生在他的学位论文中表示，“（本文）从纵的方面介绍了抗战前十年湖北省历任省主席的人事更替及

其人事政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历任主席中，较有作为者为张知本、张群、杨永泰、黄绍竑。其中张知本、杨永泰出身文人；张群、黄绍竑虽出身军人，但都有过掌管民政的经历。”“黄绍竑虽出身军人，但有过两次执掌省政的经历，其行政能力与经验，较前几任丰富。”

形势的发展，打断了黄绍竑的人生轨迹。1937年以来，日本对华全面侵略的态势日益明显，国内也在开始积极准备，再次开始大规模训练各种人员。6月19日上午，黄绍竑主持省政府委员会247次会议后即赶赴庐山，20日到达庐山并晋谒蒋介石，受命出任第二总队总队长，主要是政治干部训练。由于战时的局面，黄绍竑急于回鄂抓紧备战，参加了第一期毕业典礼后，7月11日匆匆离开庐山，13日上午又出现在省政府委员会250次会议上。

7月底，黄绍竑在视察国防工程的途中，接到总参谋长程潜的电报，要他尽快赶往南京。他立即回到武昌，8月3日主持省政府委员会254次会议，把当前工作交代后离开湖北。4日到达南京，紧张开展工作，并出任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长（第一部部长、军令部部长）的要职。下图是蒋介石分别于8月16、24日给黄绍竑部长（而不是称他为黄绍竑主席）的手谕。

黄绍竑虽是军人出身，也感到离开军队的时间较长，自认为十多年来“一向都混在行政界中，对于军事只在中间干了几件打杂的工作”。但是面对民族存亡胜败的大局，他选择毅然肩负起来。在短短的数日里，组建了机构，拟定了抗战初期的作战方案。9月初受最高统帅部的委托赴山西前线督战，与阎锡山、周恩来、彭德怀共商三晋大地的抗战大计。27日，回到离开近两个月的武昌，



28日主持省政府委员会263次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主持省政府委员会会议，当天晚上返回南京。1937年1月22日，黄绍竑主持第一次省政府委员会（第226次会议）；9月28日他主持最后一次。总共37次会议，主持25次，请假12次，基本上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为全国工作。

1937年10月7日，行政院发布消息，湖北省政府主席由何成濬代理，这时黄绍竑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身份正在晋东地区指挥娘子关战役。11月20日，黄绍竑被免去湖北省政府主席，再次回到浙江，担任即将沦陷的浙江省政府主席。

参考文献：

- [1] 广西文史研究馆编：《黄绍竑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 [2] 黄梦年：《武昌起义后广西学生军北伐》《辛亥革命在广西——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广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 [3] 《武汉日报》1936—1937年相关报道。

[4] 《新民报（汉口）》1937年相关报道。

[5] 魏元晋：《何成濬与杨永泰、黄绍竑主鄂之争》，《湖北文史资料》2002年第三期。

[6] 化贯军：《湖北省人事制度研究（1927—1937）——以县长的选用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05年。

[7] 《湖北省政府公告（1937年）》，湖北省档案馆藏。

[8] 黄绍竑：《湖北经济建设之途径——在湖北经济建设分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37年5月17日）》。

[9] 黄绍竑：《县政人员应有之修养与信念——对全省县政训练所第一期学员的训话（1937年1月18日）》。

[10] 黄绍竑：《吾人对于造林应有之认识——参加植树典礼演讲（1937年3月12日）》。

[11] 黄绍竑：《雪国耻应先雪人耻——汉口市第四届公务人员暨全市小学联合运动大会训话（1937年5月8日）》。

席丹，曾任武汉市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主任

陈时与近代中国第三次全国运动会

◇ 陶光胜

陈时（1891—1953），字叔澄，湖北黄陂人，早年留学日本，1909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11年归国并参加辛亥革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加入国民党，后又参加中华革命党，1950年加入民革。

陈时是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1912年5月与其父亲陈宣恺毁家兴学，创办了中

国近代最早成立的私立大学之一——武昌中华大学。陈时也是近代群众体育运动的重要开拓者，筹备召开了第三次全国运动会，参与筹建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华中体育联合会等，为推进中国体育现代化做出了卓越贡献。

积极筹划全运会

1923年5月，中国在日本大阪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上遭遇大面积惨败，除足球之外，其他项目的比赛成绩很差，引起体育界人士的深刻反思。

陈时在《第三次全国运动会筹备经过述要》中，对远东运动会的失利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认为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事前无专管机关之组织；二是全国运动家平时无练习之联络；三是国人多不明其为国际资格之竞争，其权遂寄于友邦



陈时肖像

热心教育者之手；四是国内教育家热心体育者，只有提倡之热诚而不能积极负责；五是政府及社会领袖，不重视体育。”

受此刺激，为推动和改观国内体育运动，一批体育界人士积极活动，筹划发起全国性体育机关，提议举办全国性运动会，以便既能引起政府和社会对体育运动的重视，又能为运动员提供交流切磋和提高运动成绩的机会。

1924年1月9日，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商定，于5月22—24日在武昌举办第三次全国运动会，推选湖北督军萧耀南为名誉会长，严修为会长（后因严修生病请辞，改熊希龄为会长），阎锡山、黄炎培、张伯苓、汪精卫、陈时为副会长，王正廷为董事长，董事由各省长官名流充任。陈时兼任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负责一切筹备事宜。筹备委员会下设总书记、司库、事务主任、运动主任、招待主任、建筑主任，负责人分别是宋如海、张少伯、黄止端、郝更生、胡庆生、袁文凤。

为何叫第三次全国运动会，为何在武昌举行？全运会的通告已交代得非常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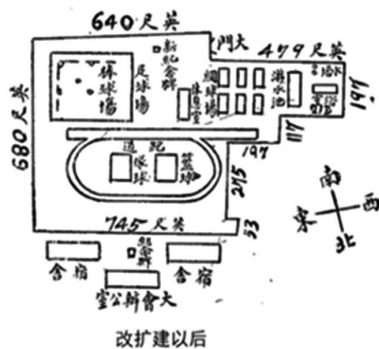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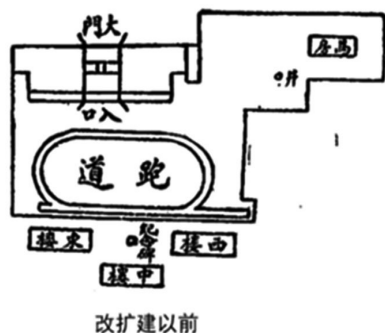
“中华全国运动会，已由业余运动会决议，本年五月二十二三四日在武昌举行，现正分途接洽，以便热心体育者届时参加。查此会第一次系在南京举行，第二次系在北京天坛举行，此为第三次。

吾国北部每年有华北运动会之组织，东南有远东运动会之成迹，惟中部此等结合，正在萌芽。卜地武昌者，藉以增进体育上之兴趣。况地居全国中枢，交通便利，气

候温和，萃全国体育领袖于一场，所以扬国光而增友谊。湖北政学各界对此极表同情，已成立之公共体育场，宅地宏敞，适合本会之需，为此通告全国，务希特表同情，惠然加入。”

为加快推进筹备事宜，1月10日上午，筹委会在中华大学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当天下午，陈时会同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葛雷、宋如海拜会萧耀南，商谈全运会筹备一事，包括大会日期、会场选址、会场整修、经费拨款、组织人事等事项，得到了萧耀南的大力支持。陈时在会见时特别提出：“全国运动会既蒙督军允准在鄂举行，现在即须筹备一切。查公共运动场略嫌窄狭，尚须开拓补修，年内非动工不可，务请从速发给垫款。”陈时的请求得到了萧耀南的支持，萧耀南答称：“举行大规模之运动会场自应布置合宜，即请博士（“博士”指葛雷）及陈先生招工估勘。垫款一层，不成问题，诸君认定要多少，即可筹拨多少也。”至此，制约运动会最大难题的经费和场地问题，有了较好的解决方案。

湖北第一公共体育场旋即于1月20日开工扩充，将运动场拓大，所有大门内房屋完全拆去辟为球场，大门改为西向面对大朝街。1月中旬，葛雷从武汉返回上海以后，



湖北武昌公共体育场改扩建前后对比图

便公开发布了第三次全国运动会第一号通告，全运会正式拉开序幕，“第三次全国运动会，遂如春雷之启蛰矣”。

争取体育自主权

清末民初，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国门的打开，作为西方文化组成部分的近代体育文化随之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碰撞、交流、融合，各类近代体育项目在社会和学校也日渐兴盛。体育在娱乐身心、强健体魄、凝聚力量乃至救亡图存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陈时对此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他曾说：“我国当着这种外侮日迫之秋，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具有健强的体格，因为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假使没有健全体格，是没有用的……即是要普及运动，那么我们民族的精神，才能振作，才能发扬光大。”这也是陈时热心体育，积极奔走，竭力筹办第三次全国运动会的重要原因。

但是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灾难深重、主权沦丧，体育领域也不例外，全国大型体育活动与体育赛事的举办均由外国人一手操办。1910年，第一次全国运动会主持者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美国传教士爱克斯纳；1914年，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名义上是由“北京体育竞进会”主办，但实际上是由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美国人侯格兰德具体操办。此外，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的书记是美国人葛雷，中华全国体育研究会的主任是美国人麦克乐等等。1923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上，代表中国代表团讲话的是美国人葛雷，舆论哗然，体育自主权的回归呼之欲出。清末民初，外国人对中国体育界的把持具有特殊的两面性。虽然在客观上它对于传播现代体育理念、培养体育



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校门

人才、推广体育运动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毋庸置疑的是，它是西方殖民和文化入侵的产物，对国家主权、民族尊严是一种侵害。

经过陈时等人的不懈努力和精心筹备，第三次全国运动会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运动会”、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举办的全国大型运动会，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其主要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体育自主权的初步回归。此次全运会虽然仍由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举办，但全运会的领导班子全部是中国人，全运会中的更多主要职务也由中国人担任，由中国人独立举行、独力自营，基本实现了“由中国人办中国体育”。前两届全运会的主要职员、裁判员大多由外国人充任，本次运动会除游泳、棒球项目有三四个外国人之外，其余工作人员全部由中国人担任。运动会的文件、成绩等均用中文，田径赛的量度从英制改用世界通用的米制。

二是运动会的规模空前，项目更加完备。比赛期间，每天都有四五万人参观，参赛运动员有490多人，是第一届全运会的3倍多。参赛代表来自安徽、浙江、江苏、福建、广西、广东、贵州、云南、陕西、四川、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河南、湖南、湖北、

江西、上海、北京、天津、香港等省市和地方。海外华侨也积极组团参加，菲律宾中华基督教青年篮球队7人参赛，吉隆坡女青年会也派人参加了国术表演。除第二届全运会已有的田径、足球、篮球、队球（排球）、棒球、网球6项竞赛外，又增加了游泳、拳术、童子军表演及体操4种，在田径中增加了三级跳远和标枪，取消了1英里长跑，改为5000米。

三是开创了女子参加重大体育赛事的先河。本届运动会突破纲常伦理的束缚，上海沪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武昌女子师范学校、湖南周南女校和吉隆坡华侨女青年会的女子运动员参加了女子篮球、排球、棒球、武术和器械操的比赛和表演，成为中国体育史上的一大创举，有力地提高了妇女地位，推进了妇女解放。

全运会盛况空前

第一号公告发出以后，陈时便着手推进各项筹备工作，随后又陆续发出第二号、第三号公告，详细周知运动会秩序、运动服制、到会时间、接待方案、代表队额定人数、妇女参赛办法、交通费用减免办法、报名方式、童子军比赛办法、体操比赛办法等相关细节。根据筹委会安排，陈时还要完全负责中国拳术比赛的报名、参赛事宜。

随着比赛日期的逐步临近，5月12日晚上，为了进一步做好筹备工作，武昌筹委会在公共体育场召开会议。陈时作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向大会报告了筹备经过、筹备情形，对武昌办事处的人事组织进行了安排和分工，对各省代表和选手的招待、交通、住宿等进行了周密部署，安排武汉童子军专门担任接待和行李运送等工作，并根据与萧

耀南的会谈结果，拟向参会代表及选手赠送古式黄鹤楼银质金色纪念章一座。陈时同时就售卖门票一事，提请大会讨论，因为“照前两次全国运动会之先例，均系卖券。然以湖北习惯，向无卖券办法，故各校均反对卖券。昨者，教育会开评干联席会议，亦不以卖券为然。究竟卖券与否，应请大家讨论。”经过1个小时的讨论，会议商定，“各校学生一律制服整队入场，不要券。无制服之法政等校，由各校自备徽章，整队用旗，亦不要券。各校教职员由各校开单送券。此外仍卖券，但以一万五千人为限，且卖券以期前三日为截止期。”会议直到晚上10点才结束，会议同时提出，全国运动会在湖北举行，关系到湖北教育的人格名誉，主张大家振奋精神、决不敷衍，全力以赴做好各项筹备工作。

为了营造浓厚的全运会氛围，提升国民对体育运动的认识，培养民众的体育运动兴趣，筹委会在1924年5月出版的《教育与人生》杂志第31期发行全国运动会专号，刊载相关各类文章18篇，包括陈时《第三次全国运动会筹备经过述要》，黄炎培《体育在教育上之价值》，郝更生《第三次全国运动大会之经过及希望》等。

各省代表陆续到会后，筹委会更加忙



1924年第三次全国运动会华东网球队

碌。武汉各团体纷纷发起欢迎会，招待股精心组织了武汉音乐会之唱歌，精武体育会之拳术影片，商务印书馆之平民教育影片，以助余兴。运动股纠察组在会前实地考察并详细研讨了会场秩序问题，制定了会场秩序十条准则，以确保大会平安顺利举行。编辑股开始征集材料，着手整理各省祝词、各地选手姓名表、运动详细秩序表，预备发行日刊，并于大会第一日刊出。全运会裁判长人选此时也已经确定，总裁判长为张伯苓，径赛裁判长为麦克乐（后为沈嗣良），田赛裁判长为高恩养。

经过紧张筹备，1924年5月22日，第三次全国运动会在武昌如期举行，5月25日胜利闭幕。从整体上讲，此次全运会圆满而成功，气氛热烈，秩序井然，社会反响较好。很多国内外媒体进行了详细报道。特别是《教育杂志》，非常详细地报道了比赛项目、参赛队伍、田赛径赛决赛成绩表、游泳决赛成绩表、球类决赛成绩表以及各代表队详细积分情况等，全面展示了此次运动会的盛况。

借助第三届全国运动会的东风，陈时任职的中华大学在中国体育界及体育教育界也大放异彩。中华大学不仅承担了很多接待任务，也承担了一些具体的赛事筹备工作，运动会期间到校参观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中华大学向社会展现了办学成就和体育教学的成果。特别是5月24日，“当日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来参观的人很多，上午9时30分，湖北省官立、私立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约3000余人，皆穿白色制服，在场内作团体徒手操，由中华大学体育教员刘国祥领操，全场秩序井然，师生皆精神抖擞，意气昂扬。”气氛热烈感人，效果非常显著。

第三次全国运动会的顺利举办，极大

振奋了国人自主兴办体育事业的信心，称之为“国人自办全国运动集会之第一遭”。全运会结束不久，当年暑期，体育界有识之士谋划成立了一个全新的由中国人主导的全国性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陈时高票当选为9名创会董事之一。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部分成员合影，
第一排左起：冯少山、卢炜昌、沈嗣良，
第二排左起：陈时、张伯苓、王正廷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标志着外国人掌控中国体育的终结和中国自理体育的开始，中国体育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陈时作为第三次全国运动会的副会长和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为全运会的圆满举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和中华大学与第三次全国运动会一起，被永远地载入中国体育运动的光辉史册。

陶光胜，教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
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从崇府山到花园山（上）

◇ 董玉梅

在武昌诸山中，崇府山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山，从东向西全长只有 900 米，海拔只有 45.8 米，其西北有凤凰山，东北有螃蟹岬，南与胭脂山和蛇山相望。从地质学上讲，崇府山仍然属于剥蚀型低山丘陵，也正是因为有了些小丘陵，才有了武汉这个山水园林城的存在。武昌城东的诸多街巷，都围绕这些小山形成。崇府山也不例外，围绕它渐渐形成了武昌的中心城区，其范围在今天的粮道街办事处内。不过，今天的武昌，已经没有崇府山了，取而代之的是花园山。

武昌城东有崇王

崇府山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孙子朱孟炜的王府所在地。追溯源流，不可避免

地就牵扯到了朱元璋。确实，武昌的历史，和朱元璋的关系太多了。首先，朱元璋在武昌彻底消灭了陈友谅政权；其次，把第六子朱桢封在武昌做了楚王，建立了楚王府。

永乐二年（1404），朱元璋的第二十四孙、朱桢的第五子朱孟炜被册封为崇阳王，王府建在武昌城北一座小山的南麓。相比于楚王府，崇阳王府的规格要低一级，其规模和奢华程度都要小很多。但崇阳王毕竟是皇孙，因为崇阳王府的建立，小山遂得名崇府山。

我们很难找到有关崇阳王朱孟炜在崇府山的细节资料，只知道他出生于洪武二十年（1387），17 岁时被册封为崇阳王，在这个王位上坐了 44 年，直至明正统十三年二月（1448）去世，享年 61 岁。据《明实录·



楚昭王朱桢



明英宗睿皇帝朱祁镇

宗藩》记载，其去世的消息传到朝廷时，明英宗停止上朝一天，并派出官员专程到武昌祭奠。朱孟炜去世后，赐谥靖简，故而后人称其为崇阳靖简王。所谓靖，为安定、和善之意；所谓简，则为简省、简单，靖简即简约清静。作为明代一方之王，用简约清静来盖棺定论，今天的人们或许认为太溢美，但《明实录》上的另一则记载表明，朱孟炜或许真的简约清静，要求无多：即崇阳王死后，其长子朱季堞没有被册封为王。当年七月，明英宗为安抚朱季堞，专门拨给他五百石粮食，让其维持生计。

我们在这里想说的主体内容，并不是王府的故事，而是王府的建立给山体和周边城区带来了什么变化。通常，城市范围的扩大和居民区的形成，除了自然因素之外，官府、衙门的设立是促使城区扩大和居民区形成的重要原因。

崇阳王府建成后，就在山麓西端南侧靠近草埠门（后改称武胜门）正街处，建起马号。马号由马厩、马夫住房两部分组成。马号东北处有一个天然的小水塘，成为饮马池。据杨朝伟所编《历史文化街区——昙华林》一书所言，这片水域正是当年崇阳王府的饮马池。笔者认为，该书所言明代崇

阳王府的“马号”也许并非养马场，也并非由崇阳王府建立，而很有可能是楚王府建的驿站。因为明洪武初年，朱元璋在全国各地建立了统一的官方文书传递驿站——“马号”。所有经过马号驿站的文件都要备案记录，责任明确，出了问题便于追查。为保证马能“日行千里”，马号必须有饲马、养马的好手，以备驿臣迅速换马。马号的职责是要备足

粮草，确保驿臣和驿马吃饱喝足休息好。所以，驿站称为马号也很正常。

在古代，因为交通运输能力不足，马在骑乘、挽车和载重，甚至在战争和劳作中，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今天用于衡量机器功率的单位“马力”，就是因为马是古代拉车的主要动力而命名。在古代战争中，骑兵就是奇兵。无论从运力还是从兵力出发，养马都是军队、王府极其重视的，楚王府也不例外。

马号建立之时，崇府山周围和武胜门正街一带的人烟并不稠密。但从永乐二年（1404）崇王府开建起，至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共145年的时间里，崇府山一带不断开山辟路，环绕山体不断兴建官府衙门。西麓的四衙巷、太平试馆等衙门的建立，还有粮道街、候补街等街巷的形成，让崇府山一带人烟渐次稠密，街巷市里逐渐相连。沿着马号形成的街巷，得名老马号巷。与此相关的还有一条路称为马道门，它在武昌不算长，20世纪60年代的门牌号码只有1—29号。

明亡清起，马号换了主人，出入马号的都是军人和官员，饮马池边换上了清军的战马和新朝的达官贵人的坐骑。随着时间的



《湖北省城内外街道总图》中的老马号、操家塘

迁延，人口继续增多，老马号巷也不断延伸，王府的记忆渐渐被民间烟火气冲淡。一户操姓人家出资购买了饮马池及周边的地域，饮马池更名操家塘。在 1883 年的《湖北省城内外街道总图》中，连接崇府山和老马号的中间地段就是操家塘所在地。操家塘淤塞后，形成的街巷一度称为操家巷。操家巷和江家巷、粮道大巷相接，直通粮道街。

清末，操家巷内有一位女子舍家为尼，把私宅改建为佛教净土宗的庵堂，起名清贞祠，女子在祠内吃斋念佛。1958 年，清贞祠交给政府后，重新分配成为居民住宅。

马号、饮马池，老马号巷、操家塘、操家巷等名称间的变迁，正是楚王府建有马号的历史沉淀到地名中的结果，也是王府留给武昌历史的淡墨印痕。当然，崇王府在崇府山也留有历史印迹，这就是崇府山北的崇府山巷和崇府山南的崇府山街。

当初，崇阳王府为了方便府内的人往来于山南山北，辟有一条跨越崇府山、呈“凸”形的石板路。这条沟通山南山北的石板山路，除了王府的人使用外，也方便了山南山北的居民。清乾隆年间，郎姓宗族看中了这块福地，在石板路两边购地置屋，给郎

姓宗人居住，形成的街巷便称为郎家巷。

据史料记载：“崇府山麓有天主教堂，创于咸丰中。”咸丰年间天主教堂渗透的范围，正在郎家巷一带，所以，这里逐渐成为天主教的活动范围，巷内开办了天主教文学书院，这个书院后来成为了文学中学。花园山天主教堂建成后，为了保证教堂内的清静，天主堂在郎家巷通往花园山的路口两端安装大栅门，清晨开门，傍晚关门。民间称此处为“国中之国”和“武昌小租界”。

这个片区内，还有一些与传教士相关的街巷，比如民国初年形成的黄家巷，也在花园山南麓，据说就是因为一黄姓传教士居住在小巷内得名。小巷南至候补街，北接花园山巷。

武昌城东，这些沿山兴建的街巷纵横交织，蜿蜒前伸；依坡修筑的房屋参差错落，随地势起伏。站在历史的高台上，俯视这片居民区，细究这些小街小巷之名，感觉时间才是历史最好的推进者和记录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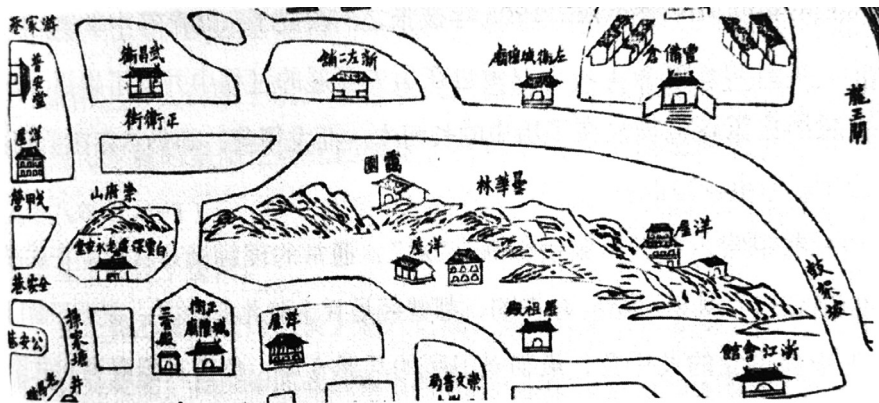
正卫街和城隍庙

比崇阳王府更早建立的还有崇府山北麓的正卫街、戈甲营。

正卫街和戈甲营，是崇府山北麓与山并行的两条街巷。如今，正卫街早被崇福山街取而代之。但在明代，正卫街是武昌城东响当当的名街。所谓的“卫”，是明朝亲王自己的军队，楚王府有两支军队，称为左卫和右卫，其中右卫又称为正卫。

“卫”是军事机构的名称，明代初年在京城和各地设立的军事驻军都称为“卫”。“卫”分为几个层级，第一层是卫所，一个卫所单位约有 5600 人；卫所下设千户所、百户所，千户所有 1120 人，百户所有 112 人。

卫所的士兵都有军籍，属于世袭军人。卫所的军士分为两部分，大部分参与屯田，小部分用以驻防。军饷的大部分来自屯田的收入。每卫的管辖范围不等，有管一个府的，也有管多个府的，管辖情况根据军事需要划定。



《湖北省城内外街道总图》中的正卫街、武昌卫、左卫城隍庙、霏园

明代著名的卫有

天津卫、威海卫、密云卫(北京)、孝陵卫(南京)，当然，少不了咱们的武昌卫。

正卫街的得名，正是因为武昌卫指挥使司衙门在这条街上。那时候，在这条街上出入的都是戎马倥偬、英姿勃发的军士。也有人认为，正卫街的得名是因为衙门门楼上高悬着威严庄重的“正卫衙门”四个大字。正卫衙门守备、千总等官员，为区别武昌左卫，才在衙门门楼上写上“正卫衙门”，但把这作为正卫街得名的原因还是颇为牵强的。府衙地名的形成，与门楼上的匾额关系不大，因为衙门本身存在的力量，是远远超越一个匾额的。在这条街上驻扎的军士，也不可能只有 5600 人，只有少量的兵士作为镇守、保卫武昌的警备力量。当然，他们还负责保卫各级王府，崇阳王府也在卫所的保护之中。

有文章说，武昌卫是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开始设置的，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作为湖广会城的武昌，明代伊始便建有卫所，其管理机构称为都卫。据《太祖实录》卷一〇一记载：洪武七年(1374)春，江夏侯周德兴给朱元璋奏报卫所情况。从奏报书的内容看，江夏侯管理着 15 个卫，除了武昌卫，还有汉阳卫、安陆卫、襄阳卫、

沔阳卫等，共有兵士 40899 人、马骡 1215 匹。洪武八年(1375)冬，都卫改称都指挥使司(注：都指挥使司统由中央五军都督府分别管辖)，武昌卫改称湖广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都指挥使是地方最高军事长官。其下设武昌左、右卫指挥司，右卫又称为正卫。洪武二十二年(1389)又新设置武昌卫指挥使司，最高长官称为指挥僉事，第一任指挥僉事名为鲍同。所以，我以为，正卫街的形成与崇王府的关系不大，与楚王府直接相关。

和正卫相关的还有一座庙，即正卫城隍庙。

城隍是中国原始信仰祭祀的自然神之一。中国民间信仰的神很多，这缘于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感恩的思想。中国原始信仰认为，神无所不在，所以只要“功施于民”“能御灾捍患”都要祭祀之(《五礼通考》)。周代《礼记》中记载的农田中的沟渠神——即水庸神，就是城隍神的前身。后来城市修筑城墙，城墙之外挖护城河即城壕，便有了城池之说，“城”乃城墙，“隍”乃城壕，城池合称为“城隍”，故有城必有城隍。加之城墙、城壕在防卫敌人、猛兽的攻击方面确实非常有效。故而自唐代以来，城隍便成

为了城市的守护神，各郡县都要加以祭祀。宋代以后，祭祀城隍已经成为民风习俗。至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便正式规定各府、州、县的城隍都要加以祭祀。

清代的《武汉城镇合图》中，武昌城内有4座城隍庙，以蛇山为分界线，山南有武昌府城隍庙和江夏县城隍庙，这很符合明太祖规定的各府州县都要祭祀城隍的要求。但山北还有两座以“卫”为名的城隍庙，分别是正卫城隍庙和左卫城隍庙。卫城隍庙是专门管理军中事务的。相较宋代，明代的城隍不仅管城池安全，也管军事事务，似乎明代城隍的责任更加重大。细想也很正常，城隍作为城市的守护神，本身就有着保卫城市的职能。因保卫城市的力量主要是军队，卫城隍的出现就顺理成章了。在国内，武昌有卫城隍，宁波、青岛、许昌、保定等城市也有卫城隍的遗存。

位于花园山北麓的昙华林小学，就是洪武二十二年（1389）新设置的武昌正卫衙署所在地。正卫城隍庙位于崇福山南麓的崇福山街中段操家塘旁，因正卫是正职，左卫是副职，故正卫城隍庙的建筑规格比左卫城隍庙高，面积也更大。可惜的是，正卫城隍庙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毁损，遗址上建成了居民住宅。左卫城隍庙旧址坐落在城山（即螃蟹岬）南麓的昙华林东段。1903年被张之洞改成了“东路高等小学堂”（注：东路高等小学堂后改办文普通中学堂，1912年改为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校，后又与湖北省武昌高级中学等校合并，1952年改为湖北省武昌第一中学，1955年定名为武汉市第十四中学）。

正卫衙署没有了，正卫街也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并入了崇福山街。一段历史就这样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与之相平行的

戈甲营，却仍然存在于花园山下。

戈甲营，应该和卫所紧密相联。“营”，通常理解就是兵营，在武汉的地名中，凡以营存在的，都曾经是兵士驻扎的地方。在正卫衙门正南面设立的戈甲营，最初是卫所的兵器仓库，既负责提调兵器，也负责武器制造。从1883年《湖北省城内外街道总图》上看，戈甲营设在武胜门正街旁，肯定有原料运输和武器运送之便的考虑。当时的戈甲营内，聚集了一批在冶铁业、冶铸业方面各有所长的能工巧匠，他们制造的兵器标准统一、做工讲究，戈矛、矢箭、盾牌、盔甲等武器、装备和土枪，源源不断送到军队中去。

明代驻守武昌的军士，清代驻守武昌的旗兵、绿营兵、防营兵等，兵力达数千人，这些不同的武装力量，需要大量的装备供应，包括武器的更新换代，数量也是相当庞大的。

清末，张之洞编练湖北新军，办起汉阳兵工厂，废戈矛土枪，代之新式武器，戈甲营虽完成了使命，但演变成街巷之名，仍然可以记录那段逝去的历史。今天，戈甲营街上遗存少量清代、民国时期的阁楼、牌匾，作为一段历史的见证，仍在讲述花园山下的故事。

武昌城东的兴旺、崇府山一带之所以成为武昌历史文化集中的老城区，楚王府、崇阳王府和天主教堂均功不可没。

正卫街和辛亥革命也有关系。共进会负责人刘公的公馆其实在正卫街上。1911年仲夏，刘公刚从日本留学回国，就捐给共进会3000元，作为首义前革命活动经费。有一天，刘公在正卫街刘家公馆大会客厅内，给前来的赵学魁和陈磊（陈潭秋之兄）看十八星旗的设计图样。他拿出一张纸质的“十八星旗”图样，要求他们绘制二十面义

旗。刘公指着图样解释说“红地黑九角表示‘铁血精神’，决心推翻清王朝；黑九角及角间的十八颗小黄圆星代表关内十八个行省，寓国家统一、民族和睦之意”。赵学魁当即买来红布，画成底稿。

因需要量大，刘公又派杂役代买了墨、毛笔和一方大砚盘，并从刘天宝药铺买来了藤黄。他们三人一边磨墨，一边铺开剪好的方形红布。赵学魁用墨水在应是黑色的地方涂上。由于没有黄颜料，在应着黄色的地方用藤黄涂上。他们每天下午齐集刘公馆描画出二十面旗帜，由邓玉麟找草湖门（今积玉桥）一位裁缝师傅乘夜半之机秘密缝制。只因事关重大，深恐泄漏机密，每次皆由邓送两面，缝好取回后再送两面。先期缝好的十八面旗帜分别保管在汉口孙武处和武昌刘公馆。

辛亥革命时的十八星旗是从正卫街开始飘扬的。

王府基上建霭园

崇王府大约毁于明末张献忠入武昌时。随着明王朝的衰亡，明朝廷高高在上的王权被踏在了脚下。位于崇府山东麓的崇王府花园残址，在风雨侵蚀下被逐渐遗弃。乾隆五十八年（1793），一位刘居士出资购买花园旧基兴建霭园。能在王府旧基上建园林的人，肯定是有较高社会地位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作背景的，刘居士也不例外。

方志界大家王葆心在《续汉口丛谈》卷六记载，霭园在崇府山东麓，俗称刘家花园，是乾隆、嘉庆年间武昌城内的胜迹。

王葆心并未游过霭园，但在他的记述中，我们发现当时的学使（即学政）吴白华为霭园题写了园名，粮道刘锡嘏为霭园题写

了《霭园铭》。

吴学使的过往我们知道的不多，但吴学使题的“霭园”二字，被刘居士制成石额，光绪年间仍存于废墟之中；霭园中的白华亭，是霭园名胜之一，与吴白华的名字相扣合，这大抵是刘居士为感谢吴学使而命名的亭阁吧！

相比吴学使，粮道刘锡嘏的名气就大多了。刘锡嘏，字纯斋，号拙存，顺天通州（今北京通州）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进士，曾是翰林院的22名提调官之一，参与编撰《四库全书》。他除了任武昌府粮道之职掌督运漕粮大权之外，还曾任四川学政等职务。刘锡嘏是乾隆年间著名的文人，在四川为官时，曾为眉山的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三苏祠题“文章气节”匾额，这不是一般人敢为的。

在武昌，刘锡嘏写下文采飞扬的《霭园铭》，留下的那段历史是：刘居士用大把的资金，把霭园收拾成“丹梯百级，奇疏四敞，清音冷冷如笙佩，异境落落如列星”的幽致园林。游人未入园，便可见“江城画里”之门题；霭园不过十亩大小，因“地踞冈峦，门临空翠，凤凰翼然而右抱，黄鹄翩然而左翔”，显得意境悠远；布局也很紧凑，“中间为堂、为轩、为亭、为榭”，在堂、轩、亭、榭间有着“鹿眼之篱，虎皮之垣”；人在园中游，感觉“一木一花，名随其宜”；真可谓园不在大，精致就行。园主刘居士，喜欢“与众乐”，逢“三春花时，九秋月夜”，朋友都会携酒前来，一醉方休。霭园中，还有吸江亭、春草亭等颇多胜迹，设有来鹤茶社，供游人小憩。

大凡胜迹，必有楹联，刘锡嘏的楹联很有气魄：“挹朝爽西来，杯底岚光飞隔岸；望大江东去，詹前帆影度遥空。”园中有主

祭花神的祠堂，楹联高妙：“五百年为园主人，高台曲池，点缀江山如画里；十二月催花使者，和风甘雨，氤氲香国得春多。”

如此精致的一个园林，其命运和战火也息息相关。咸丰年间，太平军三次攻打武昌城，霭园终遭兵火所焚，毁为瓦砾。

《续汉口丛谈》卷六中还有一段涉及到霭园的文字，大意是说刘居士的后人刘宝臣供职在学部，善于绘画。他拿着自己画的霭园图，请包括王葆心在内的文化大家为其题咏。王葆心得以欣赏到《霭园图》。二人交谈时，引出了霭园“渐次为教会所购去”的历史过往。时代的变化，尽在园主的变迁之中。

因为霭园又称刘家花园，有人说崇府山改名花园山，就是因为刘家花园，此说并不太可取。因为崇府山曾经被崇福山所取代。一座山体名称的改变，其经过相当复杂。中国文化中，有以谐音寓意美好的文化现象，变字不变音，往往变一个字，其意就完全不同，这正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之处。作为前朝封建王府和地方王权象征的崇王府，至清代变为“崇福”。一字之差，其意大改，成为“积善求福”了。

从崇府山到崇福山，又到花园山，经历了并不算短的时间。这种山名的变化，没有明确的时间，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崇府山、崇福山、花园山三个名字并没有严格区分，甚至同时使用，导致晚清至民国年间的地图和书籍不尽一致。比如：1909年的《湖北省城内外详图》中已没有崇府山，花园山已经和崇福山分离，成为独立的山体。在山体间形成的街巷，也依山定名为花园山巷和崇福山巷。但在1932年的《武汉指南·名胜古迹》（第九编）中，依然还是如此记载：“崇府山，

在城东北，明崇阳王府在其山麓。”这段话没有标明崇府山已另有崇福山之称，说明至少在1932年以前，文人墨客还惦记着崇府山。

笔者认为，崇府山直至1936年才彻底被崇福山取代。在当年出版的《武昌城区街道图》中，只看到了崇福山巷和崇福山街。1939年，日本人绘制的《最新武汉三镇详图》中，“崇”字依然，“府”字已无，即所有与崇福山有关的表述全部都是“花园山（崇福山）”。崇福山和花园山的合二为一，说明1930年代后期，花园山才开始完整的取代崇福山。有明一代的历史，在山名的更迭中烟消云散了。当然，刘家花园在历史的演变中，也不可避免地淹没在花园山的背后，因为1947年的《武汉三镇合图》中，已全部标为花园山。

查阅1962年的《武汉市街道名称簿》，崇王府留在地名中的印迹，只有崇福山街了。崇福山街属于粮道街派出所管辖。这条有26个门牌号码的街巷，不是小巷，但也谈不上是大街。武昌城东这片地域的街巷就是如此，依山修建，地势较高，虽然短小，但绝无渍涝之灾。这种地理环境，非常适于居家与办学，故而人烟日渐稠密。

董玉梅，武汉地方志专家，武汉文史馆馆员

武汉市地方粮票简史

◇ 赵文兵

粮票的广泛使用始于 1955 年岁末，是城乡粮食计划供应步入管理制度化轨道的重要标志之一。按使用流通区域的不同，粮票大致可分为全国通用粮票和地方粮票。以全国通用粮票管理办法为蓝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粮食部门也制定了相应的地方粮票管理办法。

在粮食计划供应 38 年的岁月里，武汉市发行和使用的地方粮票分不同版式、不同票幅、不同面额以及不同使用时限等，林林总总，洋洋大观。

1955 年 9 月颁布的《武汉市粮食定量供应凭证使用与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本市居民在外用膳、购买粮食制成品以及临时离市外出者，凭粮食供应证向指定粮店领取粮票，抵扣供应数。这种定量控制、凭证换票的管理模式，一直延用至 1993 年粮票退出流通领域而废止。

1955 年 5 月 1 日起，武汉市开始执行按户核实计划供应，此间面世的武汉市粮食局购粮票是本市地方粮票的雏形。粮票只限



不同时期的武汉市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



1955 年版武汉市粮食局购粮票

本市范围内使用且只限使用一次，发放对象主要为各集体伙食单位和职工、上堤防汛的 시민以及寒暑假回家的学生（粮食关系在学校）等。



1965、1966 年版武汉市地方粮票

1956 年 3 月，《武汉市地方粮票使用与管理暂行办法》正式颁布，开始发行武汉市地方粮票。逐月发放、半年有效，在本市范围内使用。粮票单面印制，主图为武汉三镇地形轮廓，盖有“武汉市粮食局”红色圆形印章。

1957 年新年伊始，武汉市地方粮票改为按季度使用，规定每季发行一次且只限当季有效，当季内可以轮回投放。及至 10 月，为加强管理、堵塞漏洞，变更为分月发票、当月有效。这一严控粮票时效的管理模式延续至 1960 年年底。为节约印刷费用，武汉市地方粮票一度用已作废的 1955 年版湖北省地方粮票背面加盖后暂代。

自 1961 年 1 月起至 1964 年年底，武汉市地方粮票再度恢复为按季度发放，使用期限三个月，过期作废。

1965 年，武汉市开始印发不限期、可循环使用的地方粮票。粮票单面印制，票面为“联合收割机”图案，计有 1965 年版的贰拾斤和 1966 年版的半市斤、壹市斤、伍市斤、拾市斤 5 种面额。其中，半市斤、壹市斤、伍市斤以及贰拾斤 4 种面额，使用到 1968 年 12 月底废止。

1969 版的武汉市地方粮票计有半市斤、壹市斤、伍市斤、贰拾市斤、伍拾斤、壹佰市斤 6 种面额，当年元月开始流通使用。粮票首次采用双面印制，票面为“收割机”“巨轮”“工农兵”图案，颇具时代特色。背面盖红色圆形“武汉市粮食局革命领导小组”印章并印有“使用说明”。

“使用说明”列有三条：（一）凭本票在全市范围内可购买粮食制成品及各种粮食。（二）购粮时，按当时规定的供应品种购买。（三）本票不准买卖。涂改无效，遗失不补。

伍拾斤、壹佰市斤面额的粮票，只限于集体伙食单位和食品饮食行业按照规定和计划购买粮食，不能在市面上流通使用。

1972年，武汉市地方粮票全面换发。粮票双面印制，计有半市斤、壹市斤、伍市斤、拾市斤、伍拾斤、壹佰市斤6种面额。票面为工农业生产图景，背面盖红色圆形“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粮食局”印章，“使用说明”与旧版基本相同。该版粮票使用至1978年7月底，过期作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武汉市粮食管理出现新局面。为加强票证管理，适应流通，决定在1978年发行新版武汉市地方粮票（1977年印刷）。该版粮票计有半市斤、壹市斤、贰市斤、伍市斤、拾市斤、贰拾市斤、伍拾斤、壹佰市斤8种面额，双面印制，票面为“高炉”“武汉长江大桥”及“喜送爱国粮”图案，背面印制与旧版基本相同。6月1日起在全市范围内流通使用。

在1989—1990年的两年间，武汉市地方粮票先后两次改版。1989版的粮票，计有50克、100克、250克、500克、壹公斤、贰公斤、伍公斤、拾公斤8种面额；1990版的粮票，计有500克、壹公斤、贰公斤、伍公斤、拾公斤、贰拾伍公斤、伍拾公斤7种面额。这是武汉市地方粮票的关门之作，双面印制，计量单位由市制变更为千克制。“武汉长江大桥”“东湖”“磨山”“古琴台”“黄鹤楼”“龟山电视塔”等著名景点，以及反映工农业生产建设的场景跃然于票面，背面的红色圆形印章恢复为“武汉市粮食局”，“使用说明”与旧版基本相同。



1990版武汉市地方粮票

粮票的发放使用，为保证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贯彻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在供给短缺时期行之有效。从武汉市粮食局对历年本市地方粮票收发情况的统计看，总体上呈现为“发大于收”的态势，表明群众手中有大量粮票，够吃有余。粮票管理的制度安排，满足了群众的正常需要，节约的粮食以粮票的形式储存起来了。

赵文兵，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机器人与自动化学院高级实验师，九三学社会员，湖北省收藏家协会票证分会副会长

江汉关的“关址三迁”

◇ 王汗吾

1861年3月21日汉口设立英租界，正式对外开埠通商。外商从上海进入长江流域时，只需在上海的江海关交税，江汉关不收税。经清廷内部的上下博弈，江汉关1862年1月1日开始征收子口税，1863年1月1日开始征收关税。



最早的英租界工部局（图片左部）



1891年建成的英租界工部局新楼

今江汉关大楼位于汉口沿江大道江汉路口，它是否一直是江汉关的关址呢？史料表明不是。这个位置最初是英租界的工部局（包括巡捕房），初始建筑体量较小。1891年，英租界工部局建成新的大楼。

那么，江汉关的第一个关址究竟在哪里呢？

这牵涉到江汉关的两个职务、两个机关。一个职务叫税务司，是海关收税系统的最高官员（长期由英国人担任），办公机关叫税务司署，我们时常提到的江汉关就是这个部门；还有一个职务叫江汉关监督——监督税务、兼办通商事宜和对外交涉，由湖广总督属下的道员级别官员担任，办公机关叫江汉关监督署。这两个机关容易使人混淆。

第一处关址：今合作路江边

查看1877年《湖北汉口镇街道图》（全形画法），在英租界下首江边（今合作路口），画有相距不远的“汉关”和“巡查洋街委员公所”。1890年代的《武汉城镇合图》，同样画有相距不远的“江汉关”图形和“巡



1877年《湖北汉口镇街道图》汉关与巡查洋街委员公所、
1890年代《武汉城镇合图》江汉关与巡查洋街委员公所

查洋街委员公所”图形，应该是江汉关税务司署和江汉关监督署的第一处办公地点。这两座建筑今天不存在了，今合作路附近只有一个地方有海关的建筑，就是原文化俱乐部（今非遗中心）的老楼“江汉关职员宿舍”（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这是一个佐证。

第二处关址：今民生路江边

江汉关税务司署办公的第二处地点，在英租界旁的华界今民生路江边。据1877年《湖北汉口镇街道图》，在“洋保正”（即英租界工部局，今江汉关位置）图形的上首，“轮船招商汉局”与“招商局”图形之间有“江汉关”图形，而在苗家码头巷与熊家巷之间标注有“稽查药局”（即江汉关查禁鸦片的机构），据说是买了已经退出长江航运的旗昌洋行的房子。同据1877年《湖北汉口镇街道图》，江汉关监督署的第二处办公地点在大董家巷南，即图中“监督江汉关”图形，其背后大董家巷北有“长郡公所”图形。光绪九年（1883）《汉阳县志》记

载，“江汉关监督署在汉口大智坊，同治二年（1863）建”。湖广总督官文在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二日（1866年3月8日）奏折也说：“查汉黄德道向系分驻黄州，现既管理关务，移驻汉口，所有道署及关税通商事宜，皆须于汉镇办理，事务较繁，委员、幕友及书役人等初系租赁房屋，颇形逼仄，且时有洋人往来，自应赶造衙署以资办公。”“遵于青龙巷购得地基一段，庀材鸠工，陆续兴造，现已一律工竣，计用银一万三千八百五十八两四钱四分六厘。委因现造衙署系道关两处办公之所，不能不略为宽敞，已力求撙节，并无丝毫冒滥。”

第三处关址：今江汉路江边

在华界招商局码头旁的江汉关税务司署，据《汉口日报》1907年6月28日报道：“本镇江汉关自设立以来已40余年，所有房屋木料多半腐败，久欲改造，因欠项支绌不果。兹忽于昨日大公事房倒塌一处，幸在白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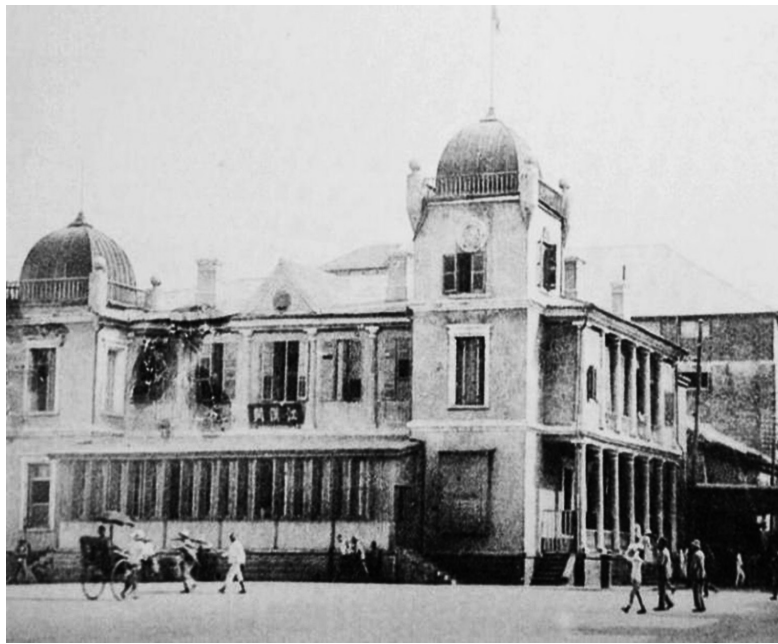
江汉关税务司署及其稽查药局、大董家巷南的江汉关监督署

尚未伤人。”这个时候，江汉关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加紧与英租界工部局商量搬到工部局大楼里（现江汉关位置）。《时报》1907年8月16日报道，“英租界巡捕房自开埠以来即设于租界之首，与华界江汉关办公所毗连。近日不知何故，该捕房竟愿将地址售与税关，已则迁于三码头。其目的何在，诚难意揣矣。”

1908年1月8日，江汉关税务司署迁入英租界工部局，英租界工部局则迁到三码头阜昌街（今南京路）。

在大董家巷南的江汉关监督署，据1914年《申报》报道：“汉口江汉关监督署于辛亥革命时，付之一炬。民国成立后，以租界之公屋为关署。因规模狭隘，前监督黄开文曾有筹款重建关署之议，以款绌未果。现任关督丁士源以目今财政奇绌，何来巨款新建公署。惟该署旧址适当繁盛地点，以营造尺丈量计，有一千三十余方，每方时价可售二百余元，总共约值二十六七万元，以之变卖，于财政不无裨益。现已详奉财政部批饬，将该旧署基地连同吹鼓亭、班房等房屋，东至花园巷，西至夏口县旧署，南至青龙巷，北至长沙会馆，各基址一并变卖开作市场，并经拟定召卖章程，招标投标承买。闻开标时以价格最高者得买，且由巡按使派员监视云。”

旧江汉关监督署房地产拍卖后，新建的江汉关监督署（今一元路）就是后来的中华民国湖北省外交司、湖北特派交涉员公署和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1950年以后，成为武汉市档案馆。



1908年，英租界工部局已挂上“江汉关”牌子

我们现在见到的江汉关大楼，是与英租界工部局、国营轮船招商局、英商太古洋行，经约20年协商土地置换后建成的（因为占地面积最终扩大了，完全置换为华界土地）。1921年，江汉关税务司署暂时迁往汇丰银行等处办公。1922年11月4日，举行江汉关新楼奠基典礼。1924年建成。

江汉关大楼由上海英商斯蒂华达生·斯贝司建筑工程公司辛浦生设计，上海魏清记营造厂承建。总高度是46.3米，超过水塔的41.3米，在60年里一直是武汉的地标。但实际上1936年建成的中国实业银行（高48.5米）比它高，但是因为在街市里头，名声不如江汉关。1984年建成的晴川饭店（高88.6米），创造了武汉建筑的新高度。

王汗吾，武汉地方志专家，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原副巡视员